

于丹《论语》感悟

作者：于丹

孝敬之道

孝敬之道(1)

《论语》的朴素和温暖，就在于里面不仅有天下大道之志，更重要的是它永远不失去脚下朴素的起点。

孝敬之道就是这样朴素的起点。

我们今天已经远离了产生孝道的宗法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父子的关系已经不存在跟君臣关系的对应，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孝”已经过时了？

是不是在今天这样一种人人平等、法律公平的社会里，“孝”就不是做人的根本了呢？

一本《论语》捧在手里，我们说它是朴素的，是温暖的，那么它的朴素和温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论语》的朴素和温暖，就在于里面不仅有天下大道之志，更重要的是它永远不失去脚下朴素的起点。

也就是说，《论语》告诉我们修养身心的道理，并且还会给出一条脚下的路，让我们抵达自己的理想。

孔子和他的学生有很多日常的问答。有一天，颜回、子路跟老师在一起聊天。老师说：“你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吧。”

子路说：“我的志向就是，衣服、车马这些好东西，与朋友一起享用，用坏了也没有有什么抱怨。这就是我的愿望。”

颜回说：“我的愿望呢，就是一个人不经常夸耀自己，也不经常宣扬自己的功劳，能够做到很谦逊也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学生们发现老师还没有说话。子路就对老师说：“希望听听老师您的志向。”

孔子呢，就淡淡地说出对自己人格理想的描述，很简单，就三句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的志向就是希望做到能够让老人得到安顿，让朋友对自己信任，让年轻人对自己怀念。

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摆脱跟三种人的关系，那就是我们的长辈——我养我的父母，我们的平辈——一生相随相伴的朋友，我们的晚辈——自己的儿女。

孔子先不去谈我要怎样建设家国社稷，怎样建立多少功勋，而是说让我的老人都可以安顿了，让我的朋友对我可以信任、托付，让孩子们觉得我这个人是值得追慕、缅怀的，如果我的存在能够让这三种人心中有这样的种种寄托，也就够了。

在这里面，摆在第一位的是“老者安之”。

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有一种美德叫孝敬，但是，我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孝吗？

一个“安”字容易做到吗？让老人外在得安其身，内在得安其心，可能每一个儿女都有自己的做法，但真正能够做好却很难。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做“百善孝为先”。一切善行都是从孝开始做起，因为这是人生中最深刻的亲情，人人不可回避。

在孝顺这件事上，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论心不论迹”。我们知道，不一定每一个孝子都有充足的钱财和很高的地位，能够按照他的梦想把爱折合成一种物质条件给他的父母。有时候一个很深刻的心愿，但是做起来却只是一件朴朴素素的小事，小到微乎其微。

对老人的这种安顿，也许我们可以有种种标准，比如买多大的房子，买什么样的车，带

老人去什么地方旅游，让他穿什么样的衣裳，有什么样的饮食，但是这些能让老人真正心安吗？

孝敬之道(2)

很多学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做“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游去问老师，什么叫做孝啊？老师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养活自己的老人就行了。但是，这真的就是孝吗？

孔子接着反问，你看狗马这些动物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你只是做到让父母衣食无忧了，但你对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这跟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这里孔子又是一个反问句：“曾是以为孝乎？”你竟然认为这是“孝”吗？

子夏问老师什么叫孝。孔子又说了一种现象，他说：做子女的要尽到孝，最不容易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你看看今天的所谓孝，就是有一些要做的事情，孩子们都会抢着去干；在一个物质条件不很丰富的情况下，尽量做到让长辈有吃有喝。但是，这样做竟然可以算“孝”吗？

子游问孝，子夏问孝，老师都铺陈了一些大家普遍认为是“孝”的行迹：去好好地做事，养着父母，有什么好吃好喝让父母先吃先喝，有什么劳顿自己可以先担当，这些事情大家都认为是孝了。但是，孔子都要反问一句，这些跟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这些真是孝吗？

孔子的反问令人深思。中国人常常将“孝”和“敬”连用，孝敬孝敬，孝为行，敬为心，关键是我们的心中对父母有那份深深的敬吗？

今天是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儿女们总是太忙太忙了。

面对父母，今天的儿女应该要问问自己：如何让老人因为有自己这个孩子而得到安顿，我们怎样做到真正的孝？

今天我们总在说，孝敬是一种美德。但是，它不是一种本能。我们反过来说一个命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人说过那是美德吗？没有，因为那是近乎本能。

这个世界上，生物之爱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很美好，但也近乎残酷：所有的爱都是下行的，也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对父母来说，儿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父母怎么尽心都不为过。

我们看到很多故事，比如孩子得了病，这父母守在手术室外边，说把我的肝脏移植给他吧，把我的肾脏移植给他吧。我想，如果能移植心脏，那可能十个妈妈里面有九个愿意。

但是，我们去找找儿女为父母做过什么的故事，可能远远不如父母对儿女做的多。

怎么理解我们做到的孝，让我们从孔子的这两个反问句开始：我能养活父母了，是孝吗？我凡事抢着做，让父母有衣有食，是孝吗？那我们先来看看，父母对孩子这一生又意味着什么？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就在一棵大树旁边玩儿。他特别喜欢这棵树。这是一棵大苹果树，长得很高，又漂亮，又有很多甜美的果子。

这孩子天天围着树，有时候爬到树上摘果子吃，有时候在树底下睡觉，有时候捡树叶，有时候他也拿着刀片、瓦片在树身上乱刻乱划。这大树特别爱这孩子，从来也不埋怨他，就天天陪他玩儿。

孝敬之道(3)

玩着玩着，孩子长大了。有一段时间他就不来了。大树很想他。过了很久，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少年了。大树问孩子，你怎么不跟我玩儿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他说，我已经长大了，不想跟你玩儿，我现在需要很多高级的玩具，我还要念书，还得要交学费呢。

大树说，真对不起，你看我也变不出玩具，这样吧，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果子都摘去卖了，你就有玩具，有学上了。这孩子一听就高兴了，把果子都摘了，欢欢喜喜走了。

就这样，每年他就是在摘果子的时候匆匆忙忙来，平时都没有时间来玩儿。等到他读书以后，又有很长时间不来了。再过一些年，这孩子已经长成一个青年，他再来到树下时候大树更老了。

大树说，哎呀，你这么长时间不来，你愿意在这儿玩会儿吗？孩子说，我现在要成家立业了，我哪儿有心思玩啊？我连安家的房子还没有呢，我也没有钱盖房子呀。

大树说，孩子，你千万不要不高兴，你把我所有的树枝都砍了就够你盖房子了。这孩子高兴起来了，把树枝都砍了，就去成家了。

这样又过了很多年，这孩子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这大树已经没有果子也没有树枝了。孩子还是不高兴，一个人心事重重地徘徊在树下。

这孩子说，我现在成长了，念完书，也成家了，我得在世界上做大事。这世界上海洋这么浩瀚，我要去远方，可我连只船都没有，我能去哪儿啊？

大树说，孩子，你别着急，你把我的树干砍了你就可以做船了。这孩子一听很高兴，砍了树干，做了一条大船出海去了。

又过了很多年，这个大树只剩下一个快要枯死的树根了。这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了。他的年纪也大了。

他回到这棵树边的时候，大树跟他说，孩子啊，真对不起，你看我现在没有果子给你吃了，也没有树干给你爬了，你就更不愿意在这儿跟我玩了。

这孩子跟大树说，其实我现在也老了，有果子我也啃不动了，有树干我也不能爬了，我从外面回来了，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树根守着歇一歇，我累了，我回来就是跟你玩的。

这个老树根很高兴，他又看见孩子小时候的样子了。

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的一生。

老树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在树下玩大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过这样的一种成长，在父母身边长大，走向社会。但为什么人到最后才会归来呢？这就是平时经常说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真到自己当了父母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有多不容易。

可是，真等到我们回到树根边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太多的遗憾了，有很多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错过了。然而，父母跟我们很少计较。

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儿女的一生，不就是从父母身上获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吗？父母付出的是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爱。

为什么孝敬是一种要大力提倡的公共美德，而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本能呢？同样是血缘，为什么下行的爱如此自觉，如此浓烈，而上行的爱有时候却显得牵强呢？

孝敬之道(4)

我很喜欢《论语》里面孔子用的那两个反问句。做到这些真的就叫孝吗？这样一问，让我们警醒。

孔子是个宽和的人，他不是特别地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怎么做，包括他最看重的那些礼仪。有一次，宰我跟老师说：“为父母守丧，一守就是三年，好像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习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刚好是一年的时间；钻燧取火的木头四季都用不同的材料，一年也就轮过一遍。那为什么我们的丧期非得三年，而不是一年呢？”

孔子就问他：“如果你服丧才一年，你就吃精米白面，你就穿绫罗锦缎，你自己觉得心安吗？”

宰我说：“我心安啊，没什么不安。”孔子就告诉他：“女(汝)安，则为之！”（《论语·阳

货》)如果你自己觉得心安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必特别地刻意。

宰我走了,他出去以后老师就很感慨。孔子说:“宰我还是做不到仁啊!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要三年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替父母守丧三年,是天下的通例啊。难道宰我就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的爱护吗?”

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父母们都手里怀里抱着,呵护之至,抱到三岁,有的父母还很惆怅,说孩子要长大了,以后我就抱不着他了。很少有父母说抱到孩子一周岁就烦了,说我抱你什么时候到头,我还要抱你两年,太烦了吧。但是,孩子长大以后,为父母守丧守到一年就有人觉得挺烦了。

孔子对宰我的言行没有横加干涉,他只是推测宰我幼年的经历可能不完美。我们看到,在孔子那里,三年之丧与三年之爱是相对应的关系,父母对子女是爱护,子女对父母是孝敬。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孤立的现象,也没有一种孤立的标准。我们都在用自己的心去揣测他人。作为子女,如果我们能够换位去想,那么与其等到父母身后,我们去尽一年之孝或者三年之孝,还不如趁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再多做一分一毫。

只要父母在一天,孩子就不会不挂在他们的心里。但是,孩子经常跟父母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妈,我最近不回来看你,实在是太忙了。”

忙,有时候是可以忙忘的,但有时候忙是可以取舍的,取重而舍次。什么是重?人们往往觉得事业是重的,朋友的快乐是重的,在这种时候,父母往往是被忽略的。

我们老是能听见父母说一句话,说:“你去忙吧,要是太忙就不一定着急回家来,打个电话就行了,让我知道你挺好就行了。”而孩子们呢,往往就把这个话当成是真的,就真会觉得父母只要知道自己在外挺好就行了。

在孩子这一生的成长中,尤其是长大以后,有时跟父母会发生冲突。有的孩子从小就有逆反心,父母孩子之间有代沟。

还有,并不是天下父母做事都正确。那么,当父母做得不对的时候,孩子真跟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上述情况,孔子有这样的建议:“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作为儿女,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有意见相左的地方,甚至你觉得父母有什么错的地方,可以委婉地去劝止。这叫做“几谏”,就是你一定要很克制地,很轻微地,能够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去劝说。“几”就是轻微、婉转的意思。

孝敬之道(5)

我们去说一个道理,道理本身是什么样也许不重要,但是表达方式很重要。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把一个很好的道理说得通,这很重要。

我们经常会学习一些人际交往准则,就是你跟同事要怎么说话,你跟朋友要怎么说话,但几乎没有一本社交宝典上会教你跟父母怎么说话,因为大家都觉得,父母是亲人,跟父母说话还需要讲究方式吗?

孩子们老说,我在外面受了气,回家跟我妈说说怎么不行?跟我妈还不能发发脾气吗?跟我妈还不能撒撒怨气吗?但是,千万要注意,往往就是最亲的人成了自己的情绪垃圾桶,有时候还会因此而受伤。

孔子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最亲的人是最伤不得的,你跟他们有什么意见相左,在说话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方式,好话能不能好好说呢?

孩子说了,有的父母会听,有的父母没听,还在坚持自己的做法,那就是“见志不从”。没听你的怎么办?“又敬不违”,做孩子的还要心存尊敬,不要去顶撞他们。

你心中可能对这事继续担忧,但不能生出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

这些就是儿女辈跟父母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圣人所提供的一种建议。

孔子从来不要求人们必须怎么做。宰我不愿意守三年丧，孔子说一年你心安则为之，也没什么。他更不会要求我们两千五百多年以后的人，你必须怎么做。他只是提这么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对很多儿女来讲，意味深长。

什么叫做“又敬不违”？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孝顺”，孝顺孝顺，顺者为孝。很多时候，我们的孝心就在于不违背。当然，也有些儿女跟父母的冲突属于大是大非。但是，如果现在做个统计，父母、儿女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究竟有多少是大是大非，关乎道德，关乎家国大义？这种事情毕竟很少。

绝大多数的冲突，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都是鸡毛蒜皮，却弄得父母心里头不高兴，儿女心里头往往也委屈，因为两代人可能动机都是好的，但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做儿女的，很容易跟父母形成的冲突就是发生在生活习惯上。我们愿意让他们生活好，比如经常指着老妈说，你看你攒的这瓶瓶罐罐，你这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你去买的全都是处理的菜和水果，咱们家生活还不至于这样呀！现在日子过好了，你还是过去的习惯，你就不能把日子过好一点吗？你不能改掉吗？这种话我们几乎都会说。

我们有时候也会指着老爸说，现在我带你去吃西餐，我带你外边去下馆子，你老舍不得吃，还老说吃不饱，非要回家来蹲在墙角吃你那碗面条，这都是你原来在农村时候的生活习惯，你就不能改掉，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听着这些数落老人的话，能说儿女不孝吗？其实，这些都发自我们的内心。但是，孔子说了一句话，叫“又敬不违”，难道我们不能顺着点父母吗？

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走到今天，都带着历史的烙印，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的习惯铸就的。如果没有老太太攒瓶瓶罐罐那段岁月，也许就没有儿女今天的生活；没有老爸蹲在墙角吃面条的那种节俭，也许你就不会从那个村庄走出来，就没有今天的楼房。

孝敬之道(6)

真正爱自己的父母就意味着包容和尊重他们的习惯。这是真正的敬。心理上的这种“敬”，直接导出来的行为层面就是“不违”。

所以，我们不是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一定要做儿女的放弃原则，但是，在可以不计较的时候，儿女要对父母多一点尊重和理解，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一种快乐的日子，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孝敬。

做晚辈的特别习惯于扶老人上下楼，这个动作有时候却招老人反感，老人经常把孩子甩开说，你觉得我现在就走不动道了？做儿女的这时候还真委屈。

其实，在物质生活大大丰富的今天，对于父母的心思做一些认真的揣测，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事，你可以做得更含蓄，更不外露，会让父母心里更自信，让他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肯定。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每一个人从他自己那条路走来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历史上沟沟坎坎留下的许多痕迹。一个人走到老年的时候，他有很多隐忍不露的地方，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对于老人来讲，有太多的东西不见得都愿意对儿女说明。他可以自己去忍过一生，那么这个时候，儿女就应该用心去想，我的父母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杂志上说：当天神把每一个小孩子派到人间的时候，总是给他们很多祝福，总是跟孩子们说，你们去吧，到这个世界上去创造吧！你们可以享受生命的成长，一生中可以有无穷的奇迹。多好的人间，你们去吧。

这些小生命很忐忑，说，天神跟我们说人间这么好，可我们也听说人间有很多的丑陋，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真到了人间，遭遇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天神保护了，怎么办呢？

天神说，放心吧，我们已经早早派去了天使，每个小生命都有一个特定的天使在等着他。

这个天使会终其一生，忠诚地对待这个孩子，在最黑暗的时候会给他光明，在最寒冷的时候会给他温暖，在所有风险来临的时候，会拼着性命保护孩子。

孩子们一听，就很放心了，问，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天使呢？

天神说，很简单，你只要叫一声“妈妈”，她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终生相守，那么，孩子对父母呢？恐怕就不是这样的了。有时候，我们的孝敬之心埋在心底，但我们会有很多借口，使得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心思或浓或淡，自己闲的时候就浓一点，自己忙的时候就淡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想想，《论语》里面关于孝的很多描述，不见得都符合今天的标准，因为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那时的生活环境与我们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础不同，比如那时盛行宗法制度，而现在的社会不太讲究这个了。

大家知道，在《论语》里面曾提倡一种行为，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就是家里面有人做了错事，比如父亲偷了只羊，甚至比这更大的错事，儿子要瞒着，不能告发，父亲对做了错事的儿子也是这样。孔子说，父子相隐就是一种很正直的行为。

这种态度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为什么孔子要这么提倡呢？我们可以先看看更深层的背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乃至各诸侯国的君位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套礼仪体系的表现形式之一。君、臣、父、子，这个关系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儿女的孝敬跟臣子的忠诚连在一起。提倡孝道，跟以礼立国有关联，所以孔子把“父慈子孝”这种伦理范畴之中的父子相隐行为纳入“礼”的秩序之中，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提倡的。

孝敬之道(7)

我们明白了那个时代跟现代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差异，就不见得要把那个时候提倡的很多行为延续到今天。但是，如果从当时的情况推断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那么有些道理对我们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比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今天的孩子，很多都是少年壮志，飘洋过海出去留学，父母在的时候怎么能不远游呢？

当然，孔子还说了后一句话，叫“游必有方”。意思是说，如果你一定要出远门，必须要有一定的去处，好让父母知道，少点担心。换句话说，就是你真正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要去做大事，是可以走的，但是走了之后，要对父母有一个交待。

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一生用了很长的时间游历天下，又曾接受朝廷的命令出使西南。在父亲司马谈病重的时候，他在外漂泊多年终于回来。在父亲身边，他接受了一个伟大的使命。

司马谈这时快不行了，但他还有心事未了。他对司马迁说：“我家先人是周朝的太史，从前名声显赫，后来家道衰落。现在我作为太史，处在当今天下一统、人才辈出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个时代却没怎么记载，心里真是恐惧啊！我死了以后，你一定会接替我做太史，继承我们祖上的职业。你一定不要忘记我要撰写的著作啊！”

司马谈又说：“所谓孝，始于事亲，接着是事君，最后必能使自己扬名后世。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是孝之大者。你记着我的话吧！”

司马迁哭着说：“小子不敏，一定好好整理父亲已经记录的历史资料，不敢有所缺失。”

司马迁就这样接受了父亲的嘱托，最后写成一部大书——《太史公书》，也就是名传后世的《史记》。

我们看到，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去完成这样一部大书，一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周游天下的经历使他开阔了视野，为这部大书奠定了基础。

所谓“游必有方”，不是毫无目的的漫游。只有类似于司马迁这样的游历才有助于人生

见识的成长。所以，司马谈才放心地让司马迁壮游天下，也在临终前郑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的志愿。《史记》这部大书的问世，最终成就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也彰显了其父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巨大影响。

儿女不简单，要供养父母，侍奉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弘扬父母之志，能够为社会去担当责任，做一些有用的事。在《论语》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这些。

《论语》中曾经这样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为什么说父在要观其志而不能观其行呢？这又跟当时的制度有关。在那个时代，当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不能独立行动的，他都得听父亲的，所以，无法观察他的行为。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志向，所以，可以通过观察他的志向来了解他。

如果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孩子就可以独立行动了。这时候，他是否孝顺尊敬他的父亲就可以通过他的行为看出来。如果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就可以说他尽到孝了。

孝敬之道(8)

孩子有什么志向姑且不论，而父亲有什么样的理想，能不能够世代相承下去，这个孩子能否做到多年不改，也很重要。司马迁就是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志向，撰写出伟大的《史记》，可以说，司马迁对其父是很好地尽到孝了。

真正的孝敬，是一个人用对自己长辈的心推及到社会上。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不仅是孝，而且是仁爱了。每一个人都希望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人人都用这样的心去做事，那就好了。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一个人要从眼下做起，一直走到社会上。孔子曾经描述过一个人人格的成长中要做哪些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之义，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讲的都是伦理亲情之爱。要先与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些亲人把关系处好了，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如果一个人言语谨慎，笃诚守信，用爱亲人的心去博爱众人，还去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他就走出了一己之爱，能够有天下大爱，他就能为社会做更多事，走得更远。

如果以上这些都做到了，孔子才说到第三个层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要是还有余力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孔子很注重实践，实践之余你才可以去学点书本知识。只能学而不能行，这在孔子看来，也许很不恰当。

我们不一定要说，那个时候的道理都适用于今天，但我们可将这些道理简单地做个坐标来参考。在今天这样一个进步的文明时代，回头看这三个层次，就会看到有时候恰恰是做反了：今天的孩子从一成长就知道要念书，在上幼儿园之前有亲子班，然后是幼儿园，然后是小学、中学、大学。每个孩子都知道要去“学文”，因为“学文”就能进入社会，进了社会以后就能有尊崇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有一些核心价值都需要人们去尊重，比如信誉，还有忠义，可是这些一步一步做完之后，到最后忘了什么呢？

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被忽视了，也就是忘了“入则孝，出则悌”。对自己亲人的这个环节是最容易忽略的。

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所讲的这番道理，不正是让一个人从脚下出发，从自己的亲人出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用这样一种本能之爱走到社会上，再做理性的提升吗？人们先把这

些最基本的东西做好了，再去学学知识、文化，让人走到更高的层次。

可今天呢？我们的心都从很远的地方缓缓归来。我们一开始都去学文化，都在努力去认同社会的公共标准。今天的小学生也知道世界地理，中学生也知道北欧历史，但是还有几个人内心能记住“入则孝，出则悌”？

古圣先贤的很多教诲，可以使我们让自己的灵魂从远方漂泊而归，回到一个温暖朴素的地方。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这些基本的道理。

这些道理为什么重要？比如说，为什么“孝”就这么重要呢？

孝敬之道(9)

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曾经解释过孝悌的重要性，他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有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孝敬自己的父母，敬爱自己的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一个人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工作，根本建立了，“道”也就有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有若说，“君子务本”。什么是“本”呢？大家看，木头的“木”字底下加一短横，这就是“本”吧。这个短横在什么位置？就在树根。什么叫“本”？就是大树的根。

人生可以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一切源自于这个根系。本要是牢固，树就可以长得好，所以很多东西要务本。“孝”在《论语》里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根本的道德而存在。

我们今天已经远离了产生孝道的宗法社会。在今天的社会中，父子的关系已经不存在跟君臣关系的对应了。

是不是在今天这样一种人人平等、法律公平的社会里，“孝”就不是做人的根本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静心而思，考虑什么是我们的核心道德，那么就会发现，一个人在处理自己跟亲人的关系上真正做好，也许不经意间会对整个社会都可以辐射出一种强大的力量。

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特别节目叫“感动中国”。就在2006年，“感动中国”中有一个人物叫林秀贞。她是河北省衡水市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入选“感动中国”的理由非常简单。

她不是我们想像中的英雄，没有惊人的事迹，她无非就是从嫁到这个村子开始，就义务赡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她自己去一家一户认门，看到刘爷爷刘奶奶瘫在床上，她跟他们说，我以后天天来给你们做饭，反正我们家喝稀饭你们就跟我喝稀饭，我们家吃窝头你们就跟我吃窝头，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断顿。

两位老人听到一个新嫁来的媳妇说了这样的话，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就从这天开始，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做，一直到了第八年，刘奶奶从破炕席底下掏出一个烂纸包，说，妮儿啊，这包是安眠药，这是我原来留着跟你刘爷爷有一天实在是动不了了才吃的，这就是我们老两口的归宿。我们听你说了要照顾我们，还真这么做了，一年两年我们不踏实，三年四年不放心，现在都八年了，我们觉得确实是用不上这个了。八年了，我们看你的心还没有变，现在这包药我可以交出来了。

林秀贞不光是养这一户，她在村里是见一个养一个，见一家养一家。她前后赡养了六位这样的孤寡老人，而且一定是养老送终。短则七年八年，长则十几二十年，每一位老人都这样养过来。

在这三十多年中间，她自己的四个儿女陆续出生，孩子们就把村里这些老人都看成自己家的爷爷奶奶，都帮着妈妈去这家剪剪指甲，帮那家拾拾柴火，大家就这样过来了。

这就是林秀贞全部的事迹，那你说她够感动中国吗？“感动中国”的推委会在写到林秀

贞这个人物推荐词时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而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

孝敬之道(10)

孔子曾经说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仁爱真的离我们很远吗？我心中想到这样做的时候，仁爱就到我身边了。我们想想，做慈善容易吗？做慈善也需要条件，没有钱你就做不了。但是，做圣贤，有时候比做慈善还容易，因为你有心就够了。

林秀贞最后当选为2006年“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之一。当时节目舞台上有一座一座的丰碑，每个人物都有一个评语镌刻在各自的碑上。林秀贞的那个碑掀开后是四个大字，叫做“温暖世道”。颁奖词说，三十年来，善良流过村庄，她用自己的心温暖了世道。

其实，林秀贞最后所做到的境界已经是仁爱了，但是她最初的起点，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村妇女的孝敬之心，无非就是把别人家的老人当成自己家的老人，如此而已。

我们人类走到今天，也许社会制度在变，但“孝”就不是为人之本了吗？也许这个理念可以不变。《论语》里说，“君子务本”。一个人去伪存真，能够在最朴素的地方见出做人的核心价值，那么在一片纷乱迷茫之中，或许他就不会走得太乱，或许他不至于走得太远。

孔子曾经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他说，一个人出外则面对公卿，为社会做事，回到家里，面对父兄去尽心，有丧事不敢不尽心竭力，而对自己的生活有节制，可以饮酒，但不会被酒困扰，对我来讲，做到这些事有什么难处呢？

我们看到，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事公卿”和“事父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想一想，在今天是不是也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很多的辉煌，但是永远也不能忘了脚下的起点，那就是父母对儿女的心。

对于孩子，父母有着太多的牵挂，比如怕他念书念得不好了，怕他为人不够正直了，惦记他没有钱买房子，惦记他的车不好被同事笑话了，惦记孩子的孩子要去受什么教育了？父母对儿女的牵挂不一而足。但是，做儿女的问问自己，我们该让父母操这么多心吗？

孟武伯曾经跟孔子问什么是孝顺，孔子回答了这样一句话：“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什么叫孝顺？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应该只有一件事，就是儿女得病了，只有这件事可以让他们真正担忧。如果说儿女病了，还能让父母不担忧，这在人之常情上说不过去。儿女都是父母心头肉，不管是儿女四十岁还是五十岁得了病，老爸老妈那也是心如刀绞，老人说还不如让我替你病呢。所以得病不让老人担忧，你是做不到的。

孔子的言外之意是说，除了得病这件事我们无法担保，别的事情你就不该让父母担忧，这才是孝敬的孩子。也就是说，你的学习就应该让父母操心吗？做人正直不正直，总要让父母念叨吗？与朋友交往，自己买房子，做生意，干工作，这些事情做得好与不好，都得让父母不断操心吗？这些都不应该让父母担心。

《论语》里面讲的道理非常朴素，记住这一句，就是儿女能让父母牵挂的只是得病这件事而已。这是你躲不开的，但别的事情能不让父母操心，你就已经是孝敬了。

孝敬之道(11)

《论语》往往就是这样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至深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人这一生步步行来，点点滴滴，父母能做的，往往是一些背后的小事。父母从来不会对儿女说嫌烦，父母也从来不在儿女面前表功。

有一个美国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小男孩，从小得了脊髓灰质炎，腿瘸了，这个病还导致他长了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很不好看，所以这孩子从小就备受冷落。小伙伴们都觉得

他又瘸又不好看，就都不跟他在一起玩。

有一天，他的父亲拿了一把小树苗回来，跟他的多个儿女说，你们一个人拿一棵树苗去种，看谁的树种得最好，我就给他买礼物。

这个小男孩跟他的哥哥姐姐一起拿了树苗种下去。这个孩子呢，由于老受冷落，就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他给那棵树苗浇了一两回水以后，心里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想法。他想，我不管了，还不如让我那棵树早早死了吧，我反正是不受人喜欢的孩子，我再想要礼物，也不会得到它的。他就再也不给那棵树浇水了。

可是，后来他却发现，他那棵树就是长得比别人的好。那棵树长得特别快，树叶长得特别鲜亮。这是一棵特别茁壮的小树。

父亲不断地对他说，天啊，儿子，你长大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你真是天才，你的树怎么这么好呢？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说，大家都看见了，在这些树苗中，只有这个孩子种得最好，我的礼物得买给他。于是父亲给这个小男孩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礼物。

后来，这孩子不断受到鼓励，他就想，这是天意。有一天半夜，他睡不着觉，心想，书上说植物都是在半夜生长，我去给我的树再浇点水吧。

他跑出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父亲在那棵树边正一勺一勺浇水呢。他突然明白，他的父亲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地为他浇着这棵小树。这棵小树就是父亲在他心里种下的一个意识，让这个孩子自信起来。

看见这一幕以后，这个孩子的生命态度就改变了。后来，他没有成为植物学家，而是成了美国总统。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这则小故事自然是虚构的，因为历史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三十九岁时才因病致残。就跟众所周知的“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一样，故事本身不一定真实，但是却反映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哲理。那么，“罗斯福与树苗”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这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啊，这种爱永远不需要走到阳光底下，永远不需要让儿女知道。你可以撞破这样一个秘密，你也可能终生都不了解。但是，有几个儿女愿意点点滴滴为父母默默做点事呢？很多儿女做点事就要嚷嚷出来，要让父母知道，孩子是爱他们的。

我还看到过一个让人很感动的儿女尽孝的小故事。有一帮朋友在一起聊天，有一个人说，我在外面时间这么长，我要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然后，他拨了一遍号码，停了一下挂断，又拨了一遍号码，拿着听筒等着，接着跟他父母说话。

他的朋友们很奇怪，问，拨第一遍占线啊？他说没有。朋友问，那为什么要拨两遍呢？

孝敬之道(12)

这个人淡淡地说，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他们只要听见电话就觉得是我的，每次都是不顾一切往前冲，恨不得扑在电话机上。我妈因为这样就经常被桌子腿绊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好，我会经常打电话，但前提是你们一定不要跑，我第一次拨通电话就响两三声，然后挂上，你们慢慢走到电话机边等着，过一会儿我一定还会打过来的。

这个故事，说实在话，是比较少见的儿女孝敬父母的故事。朋友们在一起要聊起父母对儿女的爱，大家可能随口说出一大把，但是儿女有如此之心对父母的，往往少见。其实，我倒真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发生在我们身边。

翻翻《论语》，有那么多关于“孝”的说法，说到最后，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记住的，那就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

我们为人儿女者，可以在心里问一句，我们父母的生日是哪天，他们今年多大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说得很准确。但是，做父母的要是想，我孩子哪天生日，多大了，没有几个人

想不清楚。

我们有时候觉得，老人不像孩子爱过生日，孩子过生日都是成长，他高兴，而自己的生日老人有时候忘了就忘了，淡了就淡了，他觉得自己长一岁也没有什么好。

对我们儿女来说，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知道以后，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父母高寿，得享天年，做儿女的现在还有机会孝敬他们；但惧的是父母年事又高了一岁，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在父母身边尽孝呢？我们还能够有多少心愿真正来得及完成呢？

可以说，父母之年在我们的心理可能永远是惧大于喜的，因为我们能做的太少，父母能给的太多。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至深的悲怆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的话，我们就是捶胸顿足，涕泗滂沱，再三追悔，父母在的时候少顶一句嘴多好，多做一件事就来不及啊，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来不及了。

只要父母还在，就是儿女的福分。天下儿女心，就是在这个时刻，想一想父母之年，以及在有限的岁月中，我们还来得及做什么，那么一切都有可能。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天下儿女心，我们都记住这一句话吧。也许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父母就快乐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得到安慰了。

智慧之道

智慧之道(1)

《论语》里面，自始至终充满着智慧。

智慧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东西，它不见得就是拎出来的一句两句的警句，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真正的智慧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

我们今天该如何获得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

《论语》里面，自始至终充满着智慧。

智慧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东西，它不见得就是拎出来的一句两句的警句，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论语》总是用最朴素的话去点明那个至高的真理。

樊迟在问老师什么是“知”（智）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两个字，叫做“知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天体物理，懂得生物化学，或许你都不是拥有大智慧，你只是拥有了知识；真正的智慧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

在一个充满迷茫的世界里，真正深沉的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面对每一个人以及他背后的历史，能够顺着他心灵上每一条隐秘的纹路走进他内心深处的那些欢喜和忧伤，那些心灵的愿望。

学生再问老师，知人以后要做什么呢？看来樊迟还是不能理解老师的意思。

老师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就是这样十个字，说明我们知人以后要干什么。“举直”，是把那些正直的、有才能的、善良的、符合社会核心价值的人，提拔上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空间。“措”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位置上。放在哪儿呢？放在“枉”者的上面。“枉”就是那些不正直的、不那么高尚的人。

也就是说，让贤达的、善良的人，让这些符合核心价值的人，在那些不怎么善良的、有一己之私的人之上。这是一个标准。

“能使枉者直”，这个标准更温暖。也就是说，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我们不能说某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善人，也不能说某一个人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毒小人。其实，人性中的各种元素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中，或善或恶，

在一定的环境作用下都会有所释放。

什么叫做“能使枉者直”呢？就是说，一个人他也许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高尚，也许他在做法上有一些促狭，甚至有一些卑鄙，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你了解人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力量，让一个不那么高尚的人，也就是心思可能有很多弯弯绕的人，让他起码在跟你合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正直坦荡一点？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叫“能使枉者直”。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人生的真正成功不在于你凭运气抓了一手好牌，而在于你抓了一手坏牌，但是你能把它打好。人生交往的真正成功不在于你侥幸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君子，而在于你遇到有些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当然不一定就是小人，能不能因为从跟你的交往中看到人性中的温暖、善良，看到你对他的体谅、包容，而让他美好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出来。为什么要知人呢？孔子说，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知人呢？孔子说，你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论语·为政》）这话什么意思呢？

智慧之道(2)

“视其所以”，从一开始你要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做。看他做一件事不在于他在做什么，而在于他的动机是什么。

中间“观其所由”，你要看他做事的经过和他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

最终是“察其所安”，一个人做一件事，什么叫结束或者没结束？不在于一事情物过程的终结，而在于他的心在这个结果上终于安顿了吗？有些事情完了，但人心仍然不安，意犹未尽，他还要做；有些事情没有完，但是有人可以说，雪夜访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到了朋友门前，我可以不敲门就走，因为我的心已经安了。

所以看一个人做事，不要看事情的发展过程，而要看他心理上的安顿。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视其所以”，再给我们一个过程，“观其所由”，最后给我们一个终点，“察其所安”，那么就会“人焉哉”，人还往什么地方去藏起来呢？“”，就是藏匿的意思。

当你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分析，你说这个人还怎么能藏起自己的真实面目呢？这个人的心你弄明白了。

孔子不光告诉你“知人”很重要，他还告诉你“知人”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在静止的一点上考察一个人的言与行，不能断章取义说谁说什么话了，所以他是个什么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而观其行不单在于一个结果，而在于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看起来大同小异，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一日三餐，娶妻生子，大家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个人的人生，其实是千差万别。

同样是吃饭，有些人是为了充饥，有些人是为了美食；同样是睡觉，有些人是为了休息，有些人是为了做梦。

每一个人他的动机都不相同。

你要从他的行为背后去追究到真正的原因。再说得进一步，你如何去观察一个人呢？

孔子告诉我们，你要去看一个人的过错，因为每个人的过错最终都是可以归类的，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论语·里仁》）“党”，就是结党营私的“党”，在这里指归类，每个人的过错都是可以归进哪一类的人所犯的错误。

孔子还有一句话，叫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你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就教给我们更进一步的方法，不仅要我们看每一件事的过程，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过错何在。

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很多善事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对吧？比如，扶老携幼，实行一些忠信之道，其实很多的社会基本价值是趋同的，但你看去，人的过错却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在过错里最见人心。

人这一生，其路漫漫，孰能无过？真君子不是没有过错，而是能从他的过错中洞察人心。有人是因为软弱犯错，有人是因为轻信犯错，很多人的过错是源自善良。

我们以前说过，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告诉他，你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以德报怨”不也是一种过错吗？

智慧之道(3)

有很多人都是由于内心过于慈悲、柔软，而超出了底线，所以屡屡被伤害。这也是一种过错。从这种过错中，你或许能看出这个人心中一种深刻的善良。

所以孔子说，“观过”，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义的人。这其实是一个看人的方法。这种观点很有意思，它可以超越时间，适用于不同的时代。

其实，人们面对过错的时候，怎么去观察他们，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犯错之后的态度。用孔子学生子贡的话说，君子不是不犯错，但君子之过如同日月之食，太阳和月亮都在天上，太阳再灿烂也有日食，月亮再皎洁也有月食。所以，“过也，人皆见之”，他错就错了，大家看得见，是明摆着的；“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改了之后他还好端端的，你还得仰望他。

所以，君子“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错就错了，别怕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错了不改才叫过错。这一点很重要，错就错了，马上改。

第二点，真正的君子还有一个特点，叫“不贰过”（《论语·雍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犯同样的错误。人这一辈子是可以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也要有点品质，也要高级一点，我们不能屡屡犯同样一个错误。

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情景下可能有失误，但是你要记住教训，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观察一个人的过错，难道不比观察一个人的成绩要更深刻、更见人心吗？

通过这些知人的方法，最后你考察出来的，可能是跟客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面目完全不同的结果。

有些人在游艺场上玩儿，比如大家去学赛车，一个开得特别快的新手，他已经遥遥领先。你问他为什么把车开成这样，他可能说我一直追求速度，我觉得还不够快。其实他已经是第一了。

你看到慢慢吞吞一直在后头的人，你问他开车为什么这么慢呢？这个人有可能告诉你，我觉得已经风驰电掣了，这是我生命中的极限速度，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快的体验。其实他已经是最慢的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每一个人，他的此刻都带着他以往的价值观和以往的生活坐标，他能感觉得到的是跟他自己心理上的参照。心理上觉得最快的那个人有可能是客观上比较慢的，心理上觉得还慢的人他在挑战极限，客观上他已经是最快的了。

观察一个人，是看其外在的现象，还是看他的内心，差别很大。孔子说，观察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获得大智慧。

我们想，获得大智慧以后是为了干什么？

大智慧的获得，不是为了我们蜚短流长品评人物，是为了有用。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知人之后应当知道如何用人。

大家都知道子路。子路是一个勇敢过人但智谋稍稍欠缺的人，有一次他问他的老师：“子行三军，则谁与？”（《论语·述而》）他说，老师，如果现在让你带兵打仗，你会选择跟什

么人同行呢？可能子路想，老师你这样一介儒生，带兵打仗肯定要选很勇猛的人吧。

智慧之道(4)

结果，老师告诉他：“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什么叫暴虎冯河？“暴虎”，指赤手空拳就敢搏击老虎。“冯”就是凭借的意思，读如凭。“冯河”，指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在那里，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这个人只身就敢去游大河。一个人敢这样做还不说，还要拍着胸脯保证：死而无悔，我不怕，我的勇气就足够支撑我这么去做，我用不着考虑后果。如果一个人在三军阵前这样来表态，孔子说，我反正不选择跟他同行，我不用这样的人。

那么，孔子会用什么人？孔子也说了他自己的标准：“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临事而惧啊，一事当前心里得知道害怕。

我们想一想，今天领导在下任务的时候，很可能面对两种人：第一种人听个大概马上拍胸脯说，请领导放心，我二十四小时当四十二小时干，保证完成任务，我立下军令状，完不成拿我是问，都包在我身上了。第二种人在那儿听啊听啊，最后说，您说的这件事太大，您让我回去再收集点数据，我好好考虑一个可行性方案，我尽量把它完成。这样的两种人，你会用谁？

第一种人就是敢于暴虎冯河的人。第二种人就叫做临事而惧，他是真知道害怕啊！

我们从小到大，比如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试，去见一个你特别在乎的人，这个时候你心里不会害怕吗？一定是心里有点打鼓的，因为你太在意了。那么，一件事情交给你，你轻易就敢拍胸脯吗？

二十四小时它就是二十四小时，你连第二十五小时都挤不出来，你想把它当成四十二小时过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立下这个军令状，最后完不成也就那样了，还能怎么样呢？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怕的人是最让别人害怕的。孔子说，一个人得有一点敬畏之心。一个责任摆在那里，你要来担当的时候，心里总要问一问，是不是真正沉甸甸把它当回事？

但是，惧怕也要有个分寸，你怕到打退堂鼓吗？这个事儿真的不做了吗？没个分寸，怕到不做，也不行。

所以还有后四个字，就是孔子说的，“好谋而成”。什么叫“好谋而成”？就是我真把它当回事接下来了，然后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去谋划，直至完成。孔子说，你问我用什么人吗？我就用这样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表决心的人，拍胸脯的人，声音都很大，我们还能够考虑到他心里真正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点在乎吗？我们能真正考虑一件事的可行性吗？

法国曾经出过一道智力测验题，有奖征答。测验题说，如果卢浮宫不幸失火，这个时候你只能从里面抢出一幅名画，你将抢哪幅画？

大家纷纷来作答，绝大部分人都集中在《蒙娜丽莎》上，要抢肯定抢这幅画。但是，这个大奖最后被法国当时的大作家凡尔纳拿走了。凡尔纳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抢离安全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蒙娜丽莎》在哪儿？去过卢浮宫的人都知道，它在二楼的一个大厅里，而且是一幅不大的画。我们想想，要是真着火了，一片浓烟中，别人往外逃生，你逆着人流往二楼上跑，估计你还没摸着《蒙娜丽莎》那幅画就已经被烧死了。

智慧之道(5)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

说起来很简单，第一步是要找到安全出口，要让自己能够从火海中逃出来，第二步就是

你能随手抢哪幅画就抢哪幅画。这是大智慧啊！

大智慧永远不是只知拍着胸脯瞎保证，以为一个高昂的声音就能够代表自己的品质。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只是小聪明。

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真正做到“知人”？

我们是信任大智慧，还是信任小聪明呢？其实，大智慧跟小聪明的区别，有时候只是彰显在一种态度上。

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身价亿万富婆，特别惜命。她要招聘司机，条件是这个人的技术一定要好。她的管家给她千挑万选，最后在全国挑出来三个司机。这三个人水平不相上下，技术都是绝对一流。

管家定不下来，把三人带到老太太面前说，你自己定吧。这个老太太问了他们仨同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出去，前面是悬崖，凭你的技术，能够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

第一个司机马上回答：我技术好，我能稳稳当当把车停在离悬崖一米远的地方。

第二个司机就说：我技术比他还好，我能停在离悬崖三十厘米的地方。

第三个司机想了一会：我大老远一看见悬崖就停车，我不过去。

结果，被老太太录取的司机是第三个人。

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三个人的态度上。

前面两个司机靠着技术逞强，难免不会出事。第三个司机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安全，所以他不会把技术当作炫耀的资本。

这就是大智慧和小聪明之间的区别。

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大智慧者毕竟只是少数啊，那么有小聪明的人都不要用了？有小聪明的人就什么都不干了？

就像大家翻完整部《论语》说，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好是好，可小人也不少啊，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远离那些小人呢？

真正的“知人”，是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地方，使大家各得其所。孔子就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各有其位。

真君子是什么呢？按孔子经常说的标准，君子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孔子认为，君子都是话不太多的人，不怎么唱高调，所以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个人不一定很善言辞，但是他内心非常刚毅、果敢、朴实，这种人可以大受，就是你给他一个大任务，让他去担当承受，那么他会性命相舍给你完成。

但是，这种人是不是就没缺点呢？他也有弱点，“不可小知”，就是你别拿小聪明的事情去试探他。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事情是需要小聪明的，比如说很多商务往来，有时候跟客户沟通，需要那种伶牙俐齿的人，需要八面玲珑，甚至还要阿谀奉承几句，这些事都属于小聪明，真君子肯定给你干砸了，他就做不了。

智慧之道(6)

但是怎么办呢？也有人会干这个。孔子说，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也就是说，一些小人也会有用。小人他也有长处，也就是善于言辞，能逢迎，看人脸色啊。他能够把刚才所说的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但你别认为他做好这些事就能给他大事做。真正担当大事的人不能是这样过于油滑、见风使舵的人，尽管他有小智，但不可大受。

我们看，“知人”是为了什么？知人就是为了用人。也就是说，知人以后你就能把他摆对地方。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所谓废物不过是摆错了地方的财富。人也是

一样。你能说某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一定是不称职的吗？关键是你把他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由于应用的地方不同，一尺也有显得短的时候，一寸也有显得长的时候。那么，如果将尺和寸应用在合适的地方，是不是刚好都能避开它们的短处而发挥它们的长处？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一定是我们大家认为最高尚、最有智力的人最适合干任何事情，谁也不能百事皆能。

有一个实验很有意思：都用广口玻璃瓶，一个里面放五只蜜蜂，一个里面放五只苍蝇，瓶底冲着光亮方向，瓶口朝着黑暗方向，在那里放着，看它们做什么选择。

蜜蜂的生活环境显然比苍蝇要好很多，它们合作酿蜜，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好像是有逻辑的认知，它们坚持认为出口一定是在光亮处。结果呢？五只蜜蜂都撞死了，因为它们不停往瓶底上飞，飞不出去也要往那儿飞。

什么叫无头苍蝇？瓶子里的苍蝇就是。最后那五只苍蝇都活着飞出去了，因为它们不是非朝着光亮的方向飞不可。它们误打误撞，哪儿能出去就出去了。

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以自己的判断来判定所有好的事情都一定是哪个很高尚、很有智力的人才能完成。“知人”，从知道自己到了解他人，都要摆对位置才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智慧终究是要有用的，用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什么？那取决于我们自己。对此，孔子没有一个很苛刻的、很单一的标准。

孔子说，有些人经过一生的经验修炼而成中庸之道，这种人很好，你可以跟他交往。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里没有这样的人，“不得中行而与之”，你没有找见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说，那你就可以和“狂者”、“狷者”交朋友。

什么叫“狂者”？就是凡事特激进的人。什么叫“狷者”？就是凡事很拘谨的人。为什么孔子说你还可以和这两种人交朋友呢？因为狂者有进取心，一意向前，而狷者有所不为，不肯干坏事。

这你就要看，你用朋友去补足你生活中的哪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怯懦的人，你有几个“狂者”的朋友，他们可以激励你。如果你是一个莽撞的人，你有几个“狷者”的朋友，他们可以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在我们看来，“狂者”、“狷者”显然不如“中行者”。中庸之道是完美的，但生活中哪儿有那么多完美啊？哪儿有那么多已经准备好的朋友，准备好的岗位，一切都就着你的生命给你一路鲜花地摆好啊？

智慧之道(7)

真正的智慧，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人，你都能够看到他生命中的优点，跟自己形成互补，而你自己的生命的那些优点“能使枉者直”，能够使那些原本不太好的人有所改变。可以说，这是大智慧。

那么，这样的智慧由何而来呢？孔子还是教过我们一些方法的。他说，人的智慧是可以学来的。实际上，有好多人不学，只是在那儿一个劲地困惑，普通老百姓就是这样。

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他说，有那种自己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大智慧，却凭空臆测的人，反正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孔子接着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他说，我无非就是多去听，听见好的我就跟着去学；我多去见，见到好的我就记下来。这样，我就能够不断地长进了，尽管这样的智慧是次一等的智慧。

为什么孔子说这是次一等的智慧？因为他认为人的智慧的得来，其实有四个等级。第一等叫“生而知之者”，生来就有智慧。第二等就是“学而知之者”，通过学习来了解智慧。第三等是“困而学之”的人，就是遭遇困惑了，有麻烦才临时应急想学。最次一等就是“困而不学”，就是已经遭遇困境还不学，那你当然只能认命了。孔子通过多听多见来学习，显然是第二等人。

这四个层次听起来容易划分，但是大家最容易质疑的就是第一个层次：谁是“生而知之者”，谁生来就装着满肚子的智慧？

所谓“生而知之者”，是指那种悟性特别好的人。如果说“学而知之者”是看见了什么就能够举一反三，而“生而知之者”就是凭着他的悟性可以举一反三，很多事情他无师自通，可以联系起来想，这个层次就很高了。但是，这种人很难见到。孔子是博学的人，但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只是“学而知之者”。

今天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智慧，比智慧更重要的是经验。而且，在经验里面，悟性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怎样提升我们的经验，让它能够切实合用，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体系里提供一种别人不能替代的智慧，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悟性的酝酿和提高才行。要想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层次，怎么办？

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联系起来看。

1979年12月，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在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有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来一场龙卷风。这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蝴蝶振翅效应。

为什么蝴蝶振翅能够引起那么遥远的龙卷风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事物都息息相关，凡事之间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如果看不到这些联系，那就是你的悟性不足。

如果我们的悟性够高，我们的经验有时候就能够教会我们找出最简单的方法，让一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我记得建国初期有一个事迹介绍，很有意思。当时某研究所拿到一台苏联产机器，结构非常复杂。人们想要研究它，然而拆开机器后所有工程师都傻眼了。原来，机器里面有将近一百根管子，盘根错节，这一端有那么多管子的入口，那一端有那么多管子的出口，但中间管子跟管子是怎么连接的，谁都不知道。

智慧之道(8)

大家一看，觉得不能接着拆了。所有的工程师对这台机器绞尽脑汁，但就是不知道它的结构。

这时候，研究所一个看门的老人过来了，他只用了两样东西，就把这件事解决了。

哪两样？一个是他自己手里握着的大烟斗，另一个是他拿在手上随时在传达室小黑板上记事的粉笔。他过来后就吸足了一口烟，随便找一根管子，吐进烟去，然后看见那边有一根管子冒出烟来，他就在这头写了个“1”，在那头也写了个“1”。他又吸一大口烟，再朝一根管子吐进去，又一根管子冒出烟来，他在这头写上“2”，那头写上“2”。这样做下去，最后他就把这些管子的对应关系都弄清楚了。

老人解决了问题，凭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学来的知识。其实，这是在经验基础上加上悟性才能够产生的一个实用的方法。什么是大智慧？这样的悟性就是。

知识是可能产生智慧的基础，但知识未必直接导致智慧。

真正有智慧的人，虽然从外在因素来说是可以学的，但内心必须要有自己的酝酿。那么，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酝酿呢？

我们先来看看孔子的境界。孔子能够做到的境界非常难得，叫做“子绝四”，也就是他

把四样毛病在他这儿基本做到杜绝了。哪四样呢？叫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什么意思？第一是“毋意”，意是主观臆断，就是一件事情摆在那儿，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拍脑袋一想就说它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孔子基本上不做。

第二是“毋必”，也就是说他没有抱一种必然的期待，说一件事情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走，必然有个什么结果。

第三是“毋固”，也就是说不固执己见，要真正尊重这个事情规律，尊重它的变化，然后去找它的客观走向，而不是固执于心。

第四是最难的，就是“毋我”。最后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浑然忘我的境界，然后去真正完成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这容易吗？非常不容易。

其实，人要想真正达到大智慧，最后都是要叩问内心的，就是自己的心灵智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今天的世界很纷繁复杂，所提供的机遇不一而足。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心中那种固执的心理应该是越来越少的，因为在多样化的世界上我们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

可是，有些孩子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就教他说，我以后要上北大，我以后要念清华。到了六七岁，就会说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我就要上清华建筑系。这一方面是家长觉得孩子立志，但另一方面，孩子的那种“必”与“固”的心理在心里就越来越深。也就是说，将来他没考上北大中文系，去了西语系，他就认为这是失败的；他上了清华的管理系，没有上建筑系，他也认为是失败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转换一个思路，比如说，人生不一定那么强调唯一性的目标，但你要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这就会让自己宽容很多。

什么叫目标？目标就是一个点，就是从我这里走过去，鼻子尖必须碰到那个点上，这才叫到达目标。

什么叫方向？就是从我这儿走过去，那个目标偏左十度，偏右十度，有个夹角，在这二十度之内，只要我能触达其中任何一个点，都在我的方向之内。

智慧之道(9)

我们想想，只要我知道我是向北走的，我不会走到正南、正东、正西去，那么北偏东十度、北偏西十度不可以吗？人生如果给自己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就会破掉很多盲目的执著。

在这样坚持自我的内心中，要有方向，再来与客观环境进行调试，不断地在这种调试中去实现自我，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做到这一点，就是智慧。

我们可能很迷惑，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毋我”呢？把心中那种特别自我的东西、令人困顿的东西也破除掉，容易吗？

禅宗语录中有很多有意思的问答，这就是智者听了就悠然心会的话。

一个弟子去问高僧说，我怎么才能够得到解脱啊？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心里的声音。高僧只问了他一句话：是谁绑住了你？

这个弟子又问：何方才是真正的净土啊？高僧又反问他：是谁污染了你？

弟子又问：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涅槃啊？高僧问他：是谁把生死给了你？

我们想想，这样的对话，其实就让我们走到了生命的本初源头上，变得超脱了。

我们说，中国儒家有很多观点在思想上是极其深刻的。它是一种接近纯粹哲学意味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今天的现实里把它化用于实践，它在你心里就会点醒一种彻悟。这种方法能够给你一个光明的出路。

如果有了外在的学习，又有了内心的彻悟，达到这种内外合一的时候，其实还要有一些现实的方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才行。

孔子给我们提示了这样的方法。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孔子说，你说我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我没什么大智慧。有鄙夫，也就是有个大老粗，他来问我一些问题，我脑子空空荡荡的，所以我就回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孔子说，我有个方法，就是我遇到任何事会“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说，一事当前，人要跳得出，不要沉浸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纠缠于细节，而是要抓住这件事情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事情的解决，知道问题的真相。

凡事在你眼前，你就问问自己，最好能怎么样，最坏能怎么样？然后你才可以决定怎么做。这叫“叩其两端”，就是问它两端的极值，然后来统观全局。

这里要说到一个有名的小故事。德国一个小学的课堂上，有一个小男孩特别淘气，从来不认真听讲，老师实在太烦他了，为了让他安静一会儿，给他出了道题，随口说：你坐在那儿算，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一百，你去算吧，最后得多少？

老师转身接着讲课，没过几分钟，这小男孩站起来了，说是五千零五十。老师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算出来的？那小孩说，一加一百是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是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还是一百零一，这样两头加，加到中间，五十加五十一还是一百零一，那么五十个一百零一不就是五千零五十吗？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数学家高斯。

小高斯用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叩其两端的方法。

智慧之道(10)

我们会碰到许多问题，关键在于要找到一种最简便的解决方式。在生活里，我们多容易按照既定的逻辑去走啊！我们能够跳得出来吗？只要我们问一问所谓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也就跳出来了。

我们在这样的思路上去解决问题，就不至于在细节的纠缠中耗费太多细腻的心思。

关于智慧，每个人如何去彻悟，还是有方法可寻的。所以，以知识作为积淀，以智慧作为我们努力提升的境界，每一个人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都能够找到他的意义，都能够丰富他的人生。

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指天地大道，天地间真正的道理，也包含着很多知识。“人能弘道”，人可以使这种道义弘扬、扩大，而不是说一个死的道理、死的知识，摆在那里，它就一定能够让一个人丰富壮大起来。“弘道”，关键就是人怎么样去把一个道理运用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让自己真正把它激活？

我们的生命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不仅是一种思想、知识的载体，而且是一个可以激活“道”的主体。一切澎湃于心，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心里面有所酝酿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努力。

从事任何一个职业，学习任何一门学问，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呢？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在今天，“知之者”不难做到，我们去学一门知识，拿一个文凭，读一个专业，多简单啊。拿到的文凭，就是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你拿着这个文凭就可以说我是“知之者”，但这是最低的层次。

比这个更高级的是“好之者”，就是对这个行业，我有一种真正的爱好，我会孜孜以求，会在这个事情里面不断灌注自己的热情、灵感，不断探寻追问，最后把它激活。一般人会觉得“好之”已经不容易了，能够那么投入。“好之者”固然投入得深沉，但有时候会未免沉重，有人会把毕生的精力包括休闲的时间都用在上面。“好之者”，我们经常表扬他们的一个词叫“呕心沥血”。但是，显然这还不够理想。

用孔子的话说，最高的境界叫“乐之者”，也就是说乐在其中，生命在这个职业中的穿

越是莫大的享受，这个过程时时刻刻都是快乐于心的，他所得到的也许不是一份薪水，不是一个业绩，不是一个表扬，而是自己生命的那种大欢欣。

也就是说，“乐之者”的这种境界，就是我学了一种知识，做了一份职业，在终极穿越的过程中不仅是这个行业成全了我，而且由于我自己的心智成全了这个行业，在这种相互成全中，我获得莫大的享受与欢乐。这是一个大境界。

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就说到智慧，这个世界的智慧有些是可以去观察的，有些是可以去感悟的，循着圣贤讲的这么多道理走下来，最后我们会知道，智慧最高的境界在于自己心中透彻的透悟而最终成就生命的欢欣。

所以，只要有自己的心智在，智慧才能够从知识转化而来。这种融入你的心智的东西，是内心中最好的酝酿。

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好：有一个哲学家，他每天都在思考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要做一个主题演讲，他很困扰，不知道怎么来把这个关系理顺。他准备演讲稿的时候，他几岁的小儿子在旁边不停地捣乱。

智慧之道(11)

他没法安抚住这个孩子，烦得不行，就随手翻杂志。忽然翻到杂志的封底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地图，就顺手把这一页撕下来，撕成了很多碎片扔在地上，跟孩子说，你现在把这张图画给拼上，能拼好就给你奖赏。他给了孩子一卷塑料胶条。他想，这么大点的一个小孩，这个图够你拼俩钟头的，这回可以安静了。

结果，还没有半小时，那小孩就拎着用胶条拼好的地图来了，说，爸爸，我把它拼好了。他一看，大吃一惊，果然是拼对了。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地理概念，他就问孩子是怎么完成的。

那孩子笑嘻嘻地把那个地图翻过来给他看，说：“爸爸，我发现这面是一个人的头像，我是按照这个人头拼的。我想，这个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那个世界大概也就正确了。”这个哲学家恍然大悟，他马上知道了第二天要演讲的主题：一个人正确了，他的世界大概也就正确了。

“一个人正确了，他的世界大概也就正确了。”明白这个态度，就是生活里面最高的智慧。这种智慧发乎心灵，止乎生命。

学习之道

学习之道(1)

在今天这个时代，信息纷纭复杂，很多无用、无效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头脑、耳目。我们静心想一想，这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吗？

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哪些东西真正有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学习了，但未必有效率，学到的东西也未必都对我们有价值，未必都能深入到自己的生命中去。

我们该问问自己，我们要学些什么？应该怎样去学习？学到的东西又怎样才能跟我们的生命融合起来呢？

我们提到过，《论语》里面有很多智慧，那么，智慧在人心里是怎么酝酿起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后天的学习。每个人都有向学的心愿，可各人的学习质量不同。什么人能够真正学出效率来？这里面大有深意。

孔子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曾经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每天连饭都不吃，连觉都不睡，天天在那儿冥想，一定要把世界想明白，那想破了脑袋也没有多大用处，你还不如好好去学。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概念都是一字之别，人有雄心是好事，要有野心就不大好了；人

有理想没有错，但仅仅停留在空想的话，那也就是一场梦而已。怎样能够达到一个可行的理想之境？

一个人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才能达到理想的可行之境。

在学习的时候，学问须化入内心，不然每天在真正的学问之外打转转，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孔子还说过：“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有时候一帮人在一起，群居终日，看着挺热闹，可能也能学点东西，但是你觉得大家老说不到点子上，言不及义，然后这些人还“好行小慧”，就是要小聪明，卖弄小技巧。这些都不是一种大格局。孔子说，这些人就太难教导了。你要想让他们生命境界再提升，再开阔，能够有很高的层次，那也真是难事。

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就是说某人有“局限”，比如说他工作方法有“局限”，思维方式有“局限”。何谓“局限”？局限局限，是因为格局太小，所以为其所限。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差别非常大。

如果你想达到一个开阔的生命境界，那你首先要问问自己，我的生命格局到底有多大？

学过下围棋的人就有一种感觉，一开始是老师一个棋子粘在那里，你一个棋子贴上去，最后你只能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拣零头。好老师就会教学生，先不要去学这样的一目一目的计算方式，而是要在整个的棋盘上学会布局。局布大了，一块失掉，别的地方还可以做活。

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要看在多大的格局上展开。

一个人精通一门小技艺不是难事，但是他终其一生，可能得到的只是树木，而不是森林，只是棋盘的一角，而不是全局。

难道人多，老在一起说、议，就一定有大智慧吗？有时候，一个人如果不自省，总在那儿议论，可能议论的东西完全是无用信息，是浪费精力。

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有人去找他学演讲的技巧。这人说：我的底子很好。从进门之后他就滔滔不绝。他说，你看我之所以有勇气到你这儿来，就因为我天生有语言才能，我思维敏捷，我知道哪些事情，我的底子有多好，等等。

学习之道(2)

苏格拉底看看他，说：你得交双份学费了。他说，为什么啊？苏格拉底说，我在教会你怎么使用舌头之前得先教你怎么管住舌头。

你以为一个人滔滔不绝就一定意味着有智慧吗？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一个人从道上刚听见传言，转身在路上就开始跟别人说，蜚短流长，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伪信息就是这么传播开的。孔子说，这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所需要的作风。

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位哲人，素来沉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飞奔而来，满脸神采飞扬，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重大的消息。

哲人拦住他说：你任何消息说出口之前要过三个筛子。第一，你确认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个朋友就打了个愣，说，我没这么想过，不一定。

这个哲人笑了笑，说：第二个筛子，你确认这个消息是善意的吗？那个人想了想，又不是很肯定。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恶意消息的传播往往比善意消息的传播广泛得多，负面的新闻大多比正面的新闻要传播得快。

接着，这个哲人又问了第三个问题：你用第三个筛子过一下，这个消息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这个人想了想，说，好像也不是太重要。

这个哲人说：三个筛子过完了，你这个消息就是不说出来，你自己也不会受它困扰了。

我们想一想，道听途说的事情，使你一时兴奋，但是如果真过了这三个筛子，还一定非说不可吗？生活中的信息、知识非常庞杂，接受哪些，不接受哪些，学哪些，不学哪些，怎

么不先过过脑子呢？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说，如果一个人的道德没有修养起来，对于学问又没有真正去讲求，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参照系，听到正义的事情也不能自己去做，看见自己有不善的地方也不去改正。孔子说，这些都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啊。

进一步讲，假如一个人的学问很多，可是学了东西以后，对他的生命却没有什么意思，他仍没有长进，那么这东西能成为学问吗？

在今天这个时代，世界上充满了纷纭复杂的信息。很多无用、无效的信息，没有经过任何筛子过滤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头脑、耳目。

我们静心想一想，这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吗？

那么，什么东西对我们是真正有价值的呢？这样的东西何处才能学到？学到的东西又怎么样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融合起来呢？

今天我们提起孔子，都知道他在历史上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孔子离我们今天的时代这么远，当时物质生活那么贫瘠，孔子是怎样形成他的思想体系的？他从哪儿学的？

这个问题，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就曾经问过。人们不好直接问孔子，就去问他的学生。“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你老师在哪儿学的这么多东西？子贡怎么回答呢？“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

学习之道(3)

子贡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文王武王之道，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理，从治国经世的道理到修身齐家的学问，并没有到今天就失传了，沦丧了。在哪儿呢？都在人的身上，在人间的传承里。

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学问不仅仅是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不仅仅是形成文字的东西叫知识，人的行为、价值观、习惯、礼俗，这一切都是知识的传承，都体现在人的身上，只不过人们表现得不一样罢了。

“贤者识其大者”，有生命大格局的人，贤达通透的人，他表现出来就是道理里的大处；“不贤者识其小者”，格局小的人，悟性差点的人，表现出来的无非是那些道理的小处。大处可以学，小处也可以学，所以子贡说，我的老师怎么会不随时随地都在学东西？

孔子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很简单，他是从人身上学到的。可是，他是简单的学吗？他是综合感悟，最后形成自己的体系。可见，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法无定法，师也未必有常师。

你需要向不同的人去学习东西。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几个人走在一起，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怎么跟他学呢？无非见到好的东西就跟他学，见到不好的东西就在心中警戒自己一下，以免犯同样的错误。

向书本学，不如向人世学。如果有这样一种学的悟性，处处皆可学。子贡问孔子：孔圉这个人为什么得到“文”的谥号？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说，这个人聪敏勤勉而又好学，不以向比他地位卑下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给他的谥号叫“文”。

一个人内心有智慧，敏感多思，而且愿意好好去学，甚至乐意向比自己差的人去请教问题。这是一种难得的态度。

这种态度后来被孔子的学生曾子进一步表达过。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一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什么意思呢？曾子说，一个人他自己是有能力的，还向没什么能力的人请教；一个人他

自己是很有学问的，还向学问少的人去虚心求教；一个人生命中是有格局的，但是他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一个人自己本来已经是很充实的了，但是他看起来却是虚怀若谷；一个人保持一种谦逊的、空灵的、虚静的、安闲的状态，就算有人冒犯他，他也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越是剑拔弩张，凌厉过人，是不是越容易受到冒犯？只有一个宁静的人，才可以做到“犯而不校（较）”。这样好学而又虚心、充实而又宁静的状态，是曾子羡慕的境界。历代《论语》注者都说曾子所说的这个朋友是指颜回。颜回就是一直能够这样做的人。

在这两段话里，都牵扯到一个概念，就是“不耻下问”。其实，什么是“下”呢？我们不去说知识、地位、阶层，简单的“高”与“下”就是年龄，比如说大人就一定有资格、有权利训诫小孩子吗？孩子的视点难道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另一个坐标吗？在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逻辑起点，未必要叫“高下”，不过是换一个思维的角度，换一种思考的方式。

学习之道(4)

1975年，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举行过一次盛大的聚会，有很多媒体来采访。其中一个问到这些获奖者的问题是：你们这些杰出的人物，到底是在哪一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人生中最重要东西的？结果大家认为最有价值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幼儿园。

有一个科学家说，我是在幼儿园里学到了很多，比如，要善于跟他人分享，要遵守制度和规则，饭前要洗手，对人要谦逊礼让，如果自己不小心做了错事要学会道歉。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幼儿园学到的。

假如让我们回到幼儿园，有很多道理就会很简单，因为那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思维方式。

孩子的思想，有时候是直接而简单的，但是它可能最贴近真理。

有一个测试很有意思。一个热气球上面有三个人，它在上升过程中出了故障，必须舍弃一个人才能够确保另外两个人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三个人都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第一个人是环保学家，他能够保障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第二个人是核专家，他能够去抑止战争。第三个人是农学家，他可以保障我们的粮食供给。那么，这样三个人，你会舍弃谁呢？

按成人的逻辑，一直都在比较环保、和平和粮食哪个更重要。这时候一个孩子喊了一句：“把最胖的那个扔下去！”这个答案是最简单的，但它是最合理的。

孩子有时候也会教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一个孩子跑回家，兴高采烈地跟他爸爸说：你知道吗？苹果里面藏着星星，你想要多少颗就有多少颗。他爸爸想，这又是童话，就支支吾吾说我知道了。孩子说，不，我一定要你看见。他就顺手拿过一个苹果，拦腰切了一刀。

苹果的横切面就是一颗星星的形状。孩子又切了一片，于是出现第二颗星星。孩子横着一片一片切下去，他爸爸瞠目结舌看见眼前苹果里跳出一颗又一颗的星星。孩子的发现是对的。对孩子来说，苹果里藏着星星，并不是一个童话，而是一个事实。

我们成人呢？吃苹果从来都是竖着把它剖开。我们不喜欢切横断面，所以从来不会想到苹果里藏着星星。

什么是不耻下问？有时候，孩子可以是成人的老师。不耻下问不见得一定是说我们向比自己学历浅、地位低的那些人去请教。很多时候，像孩子看世界一样，转换一种思维的方式，也许就会让我们学到更多。

我们该怎么样去学习？学习这件事，不怕联想，要举一反三。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这样。孔子从来不是一个赶着在学生不耐烦的时候填鸭一样去教育的老师，孔子的原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什么叫“愤”？就是一个人他的心思用啊用啊，用到快要穷尽处，特别想要探索，想要

发奋努力知道结果。老师说，没到这个份儿上我就不去开导他。什么叫“悱”？就是一个人心中若有所思，但嘴上就是说不出来，着急。老师说，不到这个份儿上我不去启发他。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被期待的信息才是最能有效传播的信息，一定要等到人家有那个愿望，传播起来效果才最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到这种时候，老师才跟你说了，启发你。

学习之道(5)

但是，这时候还要看你是不是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如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也就是说，跟你说了这一个叫墙角，不能看到这屋子还有另外三个墙角，那就不再教你了。我点到了，但你要是没有这个领悟的能力，我就不给你多讲了。当然，举一反三，这种善于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并不容易做到。不过，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做，更好地去学习。

一个好老师，不见得要苦口婆心，喋喋不休，才有最好的教育效果。好老师，有时候就是画龙点睛，因为他让学生自己去完成那个思考和彻悟的过程。

孔子还有一样很厉害，就是他能够做到因材施教，所以，同样的问题在他这儿得到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什么意思呢？子路来问老师：“听到一件事，我马上就要做吗？”老师说：“有父兄在，你就敢贸然行动？”你还有家长呢，你不请教他们，你上来就做，好像不合适吧？

这时候，冉有又来了，说：“听到一件事，就要做吗？”还是同样的问题，老师却断然地说：“听到了就要做。”

第三个学生公西华听见了，说，这两人问题一模一样啊，为什么跟一个人说他有父兄在不能这么做，跟另外一个说你马上就这么做。我越听越迷惑，老师，为什么呢？

老师回答说，冉有这个人生性就是怯懦退缩，他做什么事都犹豫不决，他老往后退着，所以要鼓励他赶快去做，给他一种下决心前进的力量。子路这个人，从来就是勇猛过人，勇于做事，就要让他谨慎一点，多思考，凡事掂量之后再去做，所以给他往后退的力量，约束一下他。

这就是孔子的教育。

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可以获得不同的答案，原因在于所针对的主体不同。

我们会经常遭遇一些终极追问，比如说人生终极价值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样的人生叫做成功？怎么样的生活叫做美好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终极追问如果不和个人的生命相结合，就是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幸福或者痛苦，每个人的生命状态都各有不同。

什么是真正的学习？有一个秘诀，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主体亮出来，根据自己主体的所需去学习。我们知道，医生不会将同一种维生素开给所有的人，因为有的人缺少这种维生素，有的人缺少那种维生素，每一个人都是针对他自己所缺少的部分去进行有机的补充，才能达到生命体的平衡。同样，一个人的心智思想，都需要有这样的综合平衡。

也许我们没有孔子这样的老师，但是这世界上哪里就有常师呢？只要我们善于学习，老师就无处不在。不过，我们先要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先有这样的斟酌，就不难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探索，我们的生命就会达到平衡。

学习之道(6)

每一个人，他的生命态度会决定他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故事说得好：一户人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一个天性乐观，一个天性悲观。父亲很发愁，就决定用环境改变他们。他把那个特别乐观的孩子关在马厩里，锁上门；把这个特别悲观的孩子放在屋子里，买了许多新玩具把他团团围住。

天擦黑了，爸爸先来看看悲观的孩子高兴了没有。他进去一看，那孩子坐在玩具堆里满脸是泪，一样玩具都没打开。爸爸问他，你为什么不开玩儿呢？孩子说，这一下午我越想越伤心，任何一个玩具，只要玩了它就会坏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打开哪一个。

爸爸去马厩一看，那乐观的孩子满身马粪，欢天喜地地还在马粪堆里刨着呢。爸爸问他，你找什么呢？孩子说，爸爸啊，我一直觉得这马粪堆里会藏着一只小马驹，我都找了一下午了。

你想想，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是外在的一切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常常是他内心的取向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

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个人，在学习的时候，都需要扬长避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完成的就是长处与短处的匹配和制衡。

就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中，我们能够学到太多深深浅浅的知识和感悟。可是，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学习呢？

孔子有一个说法：“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大家知道，《诗经》过去是拿来当教科书的，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人们能从《诗经》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联想能力、观察能力、合群能力和劝谏能力都能得到提高，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近侍父母，远侍君上，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说，如果有一人，他“诵《诗》三百”，把《诗经》读得倒背如流、烂熟于心，但你给他一个事情做，他却磕磕绊绊完不成，让他出去办个外交谈判的事情，也不能很顺利地跟人家谈判，那么就算他把《诗经》读得再多，都背会了，又有什么用呢？

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一个态度，就是要学以致用，做一个行动着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一直在改变着，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去承担一些责任。

宋代张载说得好，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等《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也就是说，你的心在天地之间要立得辽阔壮大，为百姓民生承担一些使命，将古代圣贤的绝世之学发挥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开太平”，去铺路，去做事。其实，这就是学以致用的态度。

也许有人要问，学到的这些东西真的都能用得上吗？《诗经》里的知识，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搁在今天怎么能够使用呢？

古代的许多知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在今天的生活中激活的。与此类似，现在有很多学生可能学富五车，可能拿到很高的文凭，但是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话，有时候他的学问就不能真正被激活。

学习之道(7)

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曾经有一个人毕业于名牌大学，数学很好，是爱迪生的得力助手。

爱迪生做实验，忙不过来，顺手拿了一个梨形的玻璃泡给这个助手，让他赶快把这个梨形玻璃泡的容积计算出来。这个助手一时发蒙，可真是犯了大难了。他想，这个梨形的东西怎么算容积？它下半段是圆的，上半段是长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公式来计算它的容积。

爱迪生正忙着做实验，过了好长时间，看见助手还在那儿摆弄，拿着许多仪器在测量计算。爱迪生忍不住了，顺手拿过来那个梨形玻璃泡，在里面灌满了水，然后把水倒在一个量杯里，告诉助手，这就是它的容积。

什么是学以致用呢？真正的学问往往是在最简单的地方。爱迪生的这个故事就是例证。

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学以致用，不仅是要考察你的智商，还考察你的情商，看你怎么样能够去变通。

有一个招聘故事说得很有意思。一个总经理要招聘助理，同时有三个应聘的人：一个人有非常高的学历，是博士，另一个人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还有一个人，显然不如前两者，学历不够高，工作经验也不够多，是刚毕业不久的一个普通大学生。

总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对秘书说，叫他们都进来吧。秘书说，你让他们坐哪儿？你的办公桌前面都空着，没一张椅子。总经理说，就这样吧。

博士第一个进来了，总经理笑着跟他说：“请坐。”那博士特别尴尬，四处看看没椅子，说，我就站着吧。总经理还说，请坐。博士说，我没有地方坐啊。总经理看看他，笑了笑，问了他几个问题，就让他走了。

第二个人进来了，总经理又跟他说“请坐”，他就一脸的谄媚，很谦卑地说，不用，我都站惯了，咱们就这么聊吧。总经理跟他聊了几句后，让他走了。

学生第三个进来了，总经理说“请坐”，他四下看看说，您能允许我上外面去搬一把椅子吗？总经理说，可以啊。这个学生出去搬了把椅子进来，坐下后就跟总经理聊起来。

最后，这个学生被留了下来。

这个故事是什么寓意呢？第一个人可能知识很多，但是他不能变通。第二个人经验很多，但是他又受经验的局限。第三个人介乎知识和经验之间，他知道在当下怎么样做是最合适的。

这里我们要说到，在学以致用的时候，没有哪一个用法就一定是对的，这里面要有变通。在孔子看来，变通是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我们看看，这里面讲了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可与共学”，有些人你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学习的。这几乎是个零门槛，很多人都想学习，那就一块儿学吧。再往上一个层次就难了，“未可与适道”，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道理。如果“可与适道”了，那再往上一个层次还是很难，“未可与立”，不见得都能立得起来，有所坚持，有所树立。

大家觉得，要是能有所树立，这个层次已经够高了吧？孔子说，就算这个人学问能立起来了，道理上都想明白，能做成了，还要再上一个层次，就更难了，叫“未可与权”。权，秤锤，引申为权衡轻重，也就是权变。可以在一起有所树立、有所成就的人，但未必都能做到通权达变。

学习之道(8)

当下一件什么事情，不太容易做，怎么办？我们经常说到“权宜之计”，就是变通一下，换个方法做，或者换个思路做。一个人坚持容易，变通难。但是一定要先有坚持，如果没有坚持，直接就变通，那是随风倒，没有原则。坚持原则之后还能通权达变，这个层次就很难。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怎么样才能够学到这样一个境界呢？

有一个故事说，兄弟俩带着一船烧得极其精美的陶瓷罐子，去一个大城市的高档市场上卖。一路颠簸辛苦，就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遇上了大风暴。一场惊涛骇浪之后，两个人精疲力尽，命是保住了。船靠岸一看，几百只瓷罐一个完整的都没有了，全都碎了。

哥哥坐在船头嚎啕大哭，说，这些罐子每一个都是精心烧制出来的，罐子上的纹路、图案都漂亮极了，我们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到一个大城市，破罐子可怎么卖？我们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也卖不出去了啊。

在他大哭的时候，弟弟上岸了。弟弟到最近的集市上转了一圈，发现这个大城市人们的审美艺术趣味都很高，不管是咖啡馆、商场，还是家庭，都特别重视装修。他拎着把斧子回来了，叮叮当当把破罐子砸得更碎。哥哥非常恼火，问，你干什么呢？弟弟笑着说，我们改卖马赛克了。

兄弟俩把所有的碎片卖到装修材料点。因为罐子本身设计特别精美，所以打成碎片以后特别有艺术感。大家一看碎片非常不规则，又这么漂亮，都很喜欢。结果这些碎片作为装修材料卖了一大笔钱。兄弟俩高高兴兴回家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权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完整的陶罐不复存在的时候，就让破碎到极致，换个方式去卖。这不是换一种思维方式吗？

有时候，思路的转换实在是一种智慧。这是在学问做到极致以后才能获得的智慧，这就是一种权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或错，对于一件事，一定要看时机，一定要看主体，一定要有前提。

孔子也不常常是一个教导者，他也有疑惑的时候。有一次，他不清楚公叔文子是什么人，就跟别人询问。“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论语·宪问》）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孔子曾经请教别人：“听说公叔文子这位老人家，从来都不说话，不笑，也不拿钱财，真是这样吗？”别人跟他说：“这是告诉你的那个人讲错了。他老人家到该说时才说，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说话；快乐时才笑，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合于礼义的钱财他才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孔子说：“原来这样啊，难道真是这样吗？”

你看，公叔文子这个人是非常有分寸的。他话是少，但是他一定要到该说的时候他才说话，所以别人都不烦他说话。他笑得是少，但要真到了快活的时候，比如有人说了个特别好玩的笑话，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或者一个大欢喜的场面，他也笑，所以没人讨厌他笑。他对钱财不是一概都拿，该他拿的他才拿，所以他拿了，也没有人指责他。

学习之道(9)

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正确吗？真正的学习，学到的知识一定是带着环境来的。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该这样做，但在另一个环境里，你该那样做。就像公叔文子一样，看具体情况，他才说话，才笑，才拿东西。

有一个哲人给学生上课，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非常脏，另外一个人很干净，请问这两个人谁会洗澡。

一个学生回答说，那当然是脏的人洗澡。老师说，不对，因为脏的人他一直就很脏，他不觉得自己脏，而干净的人他到哪儿都要干净。

第二个学生就说，那当然是干净的人洗澡。老师又说，不对，你想啊，干净的人他已经不需要洗澡了，而脏的人需要洗澡。

学生们糊涂了，那到底谁会洗澡呢？

老师说，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愿不愿意，答案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就是通过不同的角度上思考来解决；换一个角度看，结果也许就会大不一样。这对我们的学习是一个启发。

有一位修禅访道的人去请示师傅，说，每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才叫合适啊？他老师跟他说：“我讲四句话，看你能不能懂。”

第一句话说，“把自己当别人”。学生想了想说，我明白，一个人有大欢喜的时候看淡一点，觉得这也无非是别人的一件事；有大悲伤的时候看轻一点，觉得这事别人也会赶上，“把

自己当别人”，那喜忧都能很快过去。

老师又说了第二句话，“把别人当自己”。学生想了想说，这意思大概就是说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老师说：“你很不错了。”他又说了第三句话，“把别人当别人”。学生说，这个话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所以一定要本着别人的立场出发？老师说：“你说到这些，说明你的悟性很好，很不错了。”

接着，老师又说出第四句话，叫做“把自己当自己”。学生说，这句话太深了，我还需要好好地去悟。

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悟不透的话，以为这不过就是文字游戏，这里面“自己”、“别人”换来换去，先说把自己当别人，再说把别人当自己，再说把别人当别人，再说把自己当自己，这样反反复复，有价值吗？

其实，这些变换的价值就在于你每一次都换了一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一个矿泉水的瓶子，有人说它是长的，这是对的，因为你从纵向看；有人说它是圆的，也是对的，因为你从瓶底看。

当你转换不同角度的时候，学习的境界就通达了，观察世界的维度就广阔了。

孔子还提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世界上一些好的品德也需要通过学习来进行提升，而且要进行制衡。

我们想想，仁爱好吧？智慧好吧？信义好吧？正直好吧？勇敢好吧？刚强好吧？

这六种道德都很好，那么拥有这六种品德的人，他还需要学习吗？

《论语》中说：“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学习之道(10)

孔子曾经问子路：“仲由！你听说过有六种品德便会有六种弊病吗？”子路说，没有。孔子说：“那你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说。”

孔子就说，一个特别仁爱的人，他如果不学习，不思考，会有一种弊端，就是愚笨，也就是容易受人愚弄。比如说，总做以德报怨的事情，就会被人愚弄。你能说这个人不仁爱吗？但是他没分寸。

孔子说，一个人聪明，但是他要老不学习的话，最后的弊端就是这个人会活得太飘忽不定，没有根基。

孔子说，信誉好吧？笃诚守信，像尾生抱柱那样，水来了都不走，这人就未免会愚呆。如果再不好学的话，就会容易被人利用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我们知道，过于诚信而不知权变的人有时候就是容易被人陷害。

孔子又说，我们都喜欢正直的人，但是正直的人有时候说话不好听，说出的话尖刻得直刺人心，让人非常不舒服。就像鲁迅先生写的，给一个孩子做满月，有人来说这个孩子长大能当官啊，有人说这个孩子长大能挣钱，有人说这个孩子肯定会死的。最后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啊，你能说他不正直吗？但是这个话不好听。

孔子又说，好勇而不好学者，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你容易被人利用去作乱。他遇事不经过脑子，不问就里，就直接采取行动了，一个一个的乱子就起于这种有勇无谋者。

最后，孔子说，一个人刚强，刚强不好吗？“好刚而不好学”，这个人就会极端狂妄。因为他刚愎自用，那就难免有狂妄自大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过犹不及。人生不是说找到了一块好的基石，就会一成不变地好下去。

我们所有的美好品德，比如孔子所说的这六种美好品德，它为什么会带来六弊？这是因为，在实际的生活环境中，我们要经受社会的挑战、考验，非常复杂，如果不善于去调试，去变通，就很容易产生弱点而造成弊端。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了解自己，跟世界建立有效的联系；即使是“仁”、“智”、“信”、“直”、“勇”、“刚”这样的美好品德，都得在学习中完成定位和制衡。

今天的社会已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了，但是，我们学没学到真东西呢？

很多时候，虽然学习了，但未必有效率，学到的东西也未必能深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让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那个命题，一个人的生命格局究竟有多大？有一个弟子问师傅，你看我们每个人，身高也差不多，活的年头长短也差不多，为什么有些人心大，有些人心小？心大到能多大，小到能多小？

师傅跟他说，你现在闭上眼睛，用你的心造一座城池。

弟子就闭上眼睛，在那儿冥思苦想，想了一座巨大的城池，有万仞宫墙，有深深的护城河，有花草树木，有楼台亭阁，整个城池里面，各类东西纤毫毕现，一切都安顿好了。他睁开眼睛说，我造了一座巨大的城池。

师傅又说，你现在闭上眼睛，用你的心造一根毫毛。

他又闭上眼睛，想啊想啊，想了一根细细的小毫毛。他睁开眼睛说，我造好了。

学习之道(11)

这个时候，他的师傅问他，你刚才跟我说造了那么大一座城池，有那么多东西，这座城池是用你自己的心造的吗？弟子说，是啊。

师傅又接着问，你刚才跟我说又造了那么细的一根毫毛，在造这根毫毛的时候，你用的是全部的心吗？弟子恍然大悟，他说，是啊，我造一根毫毛也想不了别的事了。

这就是人心。我们都是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格局。有些人终其一生，造的城池很大，那里面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无边无际，你可以有这样的计划，有那样的梦想，你可以去安置自己的人生，经营一生的事业，调适自己跟朋友、社会的所有关系。

也有的人，心思就绊在一根毫毛上，可能是一级工资，一个职称，夫妻间的一次口角，朋友间的一场误会——这都是一根毫毛，你有可能就被绊住过不去，因为那也是你全部的心所用力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人手里，他的思维方式不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不同的。

1954年，美国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推销员叫克罗克，他推销的是奶昔机。他发现，有一家快餐店居然一下子订了八台奶昔机。他一般都是一家一家、一台一台地去推销，所以他认定这是个大主顾，就一定要上门去考察一下。

到了这家快餐店，他发现，他们经营的产品、管理的方式，都非常有意思。他了解到，这家店年盈利额很大，稳稳当当超过二十五万美金。他跟这家店的店主商量，说你能不能办成连锁加盟店，把这家店的品牌商标推广出去，我来帮你做这个事。

店主同意克罗克成为该店在全美唯一的特许经营代理商。这个时候，克罗克早已把他的奶昔机扔到九霄云外了。克罗克于是在1955年开设了该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特许经营店。此后，他创建了一套极其严格的特许经营制度，使该店的加盟店不断扩大，到1960年，居然达到了二百二十八家。

但是，克罗克知道，他还不是这家店的主人，无法真正做大这项事业。1961年，克罗克又想买下这家店。他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筹到二百七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盘下了这家店。

克罗克就这样大展拳脚。他在美国，然后在世界，从 1955 年开始，把这家店一间一间地开下去，缔造了一个饮食帝国。他只是沿用了原来老板的姓氏，原来姓麦克唐纳，这家店的标志就是这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M，麦当劳。

麦当劳为什么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地位？就因为克罗克不是站在自己只卖奶昔机的角度去经营，而是转换了一种经营思路。这种思考，就是一座无边的城池。

学习永远不是一件僵死的事情。既然没有常师，既然无处不学，既然死记硬背这种呆板的学习方式已经被抛弃了，那么，我们就要对学习进行一番认真的思索，从而开始真正的学习。

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心去完成一种激活，开始真正融会贯通的学习，都站在通权达变的大智慧上，那我相信，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都会活在我们的经验体系里，所有圣贤的智慧都可以成为照亮我们自己生命道路的火把。

诚信之道

诚信之道(1)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诚信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分量。

不过，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不讲诚信，却都似乎活得很自在。

难道，诚信竟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念吗？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诚信？

诚信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理念之一。在整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诚信的论述。

作为做人的前提、人生的基础，《论语》提出了“信”的原则。孔子曾经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要是没有信誉的话，那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度过一生？这就好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一样，它靠什么走起来呢？

大车、小车，分别指牛车和马车。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有驾牲口用的横木，这横木要怎么铆住呢？就是用木销包了铁以后插在小孔里，才能把横木固定住。和，就是牛车和马车上的木销。如果车上没有这样的木销，就无法套住牛马，它又怎么能行走呢？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就好像这个车子有了横木也是虚架上的，没有关键的木销，不就无法行走了吗？对一个人来讲，信誉是什么呢？是你行走于世界最基础的那个保障。

也就是说，只有靠信誉，才能把人生这辆车驱动起来。只有信誉，才能够让你不管穿越什么样的风险、坎坷，都颠扑不破，而在坦途上一路前行的时候，也能够保障你的速度。就是因为有信誉，才让你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立得起来。要是没有信誉，就缺少了安身立命最根本的条件。

孔子关于“信”的阐述都很简单，但这是他核心的教育理念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文，行，忠，信，这些东西就是孔子教导学生的基本内容。“忠”和“信”，占了很大的比重。

孔子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一个人要想坦坦荡荡走过一生，凭的是他为人的正直。正直的人就能安身立命，这个人的一生理所应当走得远。但是，那些不正直的、不守信用的人，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他们不是也活下来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这叫“幸而免”，他们是侥幸逃脱了很多本应该发生的责罚才磕磕绊绊地活下来的，他们迟早要摔跟头。

人要凭着正直去生活，如果是靠投机取巧、不守信誉去生活，那只是侥幸躲过了灾祸。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中国儒家提出的诚信的道德理念，放到今天，它还有价值吗？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信誉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也许信誉并不直接写进你的档案里，但是，信誉是一个人的口碑，一个人做事如何，为人如何，这都会反映在口碑中，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心中掂出信誉的分量。

江西德兴市有一个小村子叫宗儒村，村里有一个普通的农民叫王云林。2007年4月，村里发生了一场山火，他帮助别人去救火，不幸牺牲了。他走后，留下一笔糊涂账。这债务怎么办呢？他的遗孀叫陈美丽，三十一岁，一个普通的农妇。陈美丽上有年迈的婆婆，下面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才几个月大。丈夫走了，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她的肩上。陈美丽从悲痛中撑过来以后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村子里面贴了一张还债告示。

诚信之道(2)

她说，云林生前在村子里口碑很好，他为欠债的事情一直心不能安，我不希望他走得不踏实，所以我要把这个债还上。但是，他欠了谁的债，我都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欠了你的债，你就来找我吧。

还债告示贴出去以后，很多人来找陈美丽讨债。整个债款，前前后后加起来金额超过五万，而其中将近四万没有任何凭据。陈美丽全都认了下来，她就替丈夫一点一点还着这些良心债。

这个故事引起很大的轰动。我当时担任“感动中国”节目的评委，给陈美丽写评语，我说了一句话，叫做“债务有凭，良知无价”。我不知道来找她的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债权人。陈美丽的还债告示就像一面镜子，它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心是高尚，还是卑微，是贪欲，还是无欲。

我看到这个故事很感动。一个像追着别人讨债一样去追着还债、而生活在如此境遇中的农妇，什么力量让她这么做？按说她丈夫为了救火而牺牲，就算他欠债，他的这条命已经把他的债务还上了，但是她一定要去还债，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良知不安。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一个字：“信”。这个“信”字不仅仅就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内心的。

我想，社会在不断地更迭着制度，变化着环境，但是人性中一定有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价值传承下来，这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火种。我们看到，诚信不仅仅是传统经典中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它也成为了普遍的民间信仰。

大家也许都熟悉关羽归汉的故事吧。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破徐州，刘备、张飞败逃，关羽被俘。曹操对关羽惺惺相惜，一直希望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可以来辅佐自己，但是他也看出关羽不会久留，所以他一方面诚意相待，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大将张辽去探听关羽的口风。

关羽跟张辽说，我知道曹公待我恩重如山，但是我已经跟刘备有兄弟之约，生死结盟，我对他的忠心绝不会改变。我一定不会留在这里，但是我会报答了曹公之后才走。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关羽斩杀了袁绍军中大将颜良。这时候曹操知道，关羽已经报恩了，非走不可了。于是曹操对关羽厚加赏赐，而关羽呢，把所有的赏赐都封存起来，并不带走，留书告辞，去找刘备了。关羽走的时候，曹操的部将要去追，曹操把他们拦住了，说：“各为其主罢了，不要追了。”

为什么舞台上的关公永远是红脸的忠勇形象？就是因为他笃诚守信。从正史到小说，都记载或流传着关羽心恋故主的忠勇故事。现在看三国戏，大家觉得很热闹，但在那些政治纷争之外流传最久远、最深入人心的还是道德价值。

比关羽归汉这个故事再早几年，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起兵去攻打扬州刺史刘繇的根据地曲阿。刘繇这边刚好有一个老乡太史慈来投奔。太史慈骁勇善战，有人劝刘繇重用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不干，只是派他侦察敌情。太史慈只带着一个骑士，结果和孙策在神亭这个地方不期而遇，孙策却带了十三个骑兵，其中有韩当、宋谦、黄盖等厉害的

角色。太史慈一点不畏惧，拍马就冲上去跟孙策交手。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的战马，夺得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夺得孙策的头盔。正当他们生死拼搏之时，双方的救援部队同时赶到，两人都被救回。

诚信之道(3)

接下来，孙策大军步步深入，终于生擒太史慈。抓住太史慈之后，孙策亲自上前给太史慈松绑，握着他的手问：“还记得神亭的事吗？如果那时我被你抓住，会怎么样？”太史慈说：“那可不好说。”孙策很欣赏太史慈的耿直，朗声大笑，说：“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共事吧。”孙策迅速给太史慈任命了官职。

后来，刘繇在豫章郡去世，他的部将士卒还有一万多人，尚未归附，孙策就派太史慈前去招抚。孙策身边的人都说：“太史慈这一去，一定不会再回来。”孙策却很放心，说：“子义(太史慈的字)抛弃我，那么他还会去投靠谁呢？”孙策在昌门设宴为太史慈饯行，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太史慈回答：“不会超过六十天吧。”

果然，两个月到了，太史慈如期归来，顺利完成孙策交待的任务。

太史慈的信，关羽的忠，已经深深嵌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反映了人们对诚信的呼唤。

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诚信是品评人物最基本的出发点。诚信是一块试金石，验证着人品的高下。真正的诚信，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人有诚信，则不仅立于社会，也能安顿自我。

孔子看到当时礼崩乐坏的景象，所以他有这样的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要说我能见到多少圣人，那我见不着；我能见着君子就可以了。要说我能见到多少善人，我也没见到；我能见到恒定如常保持好品德的人，就很不错了。

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呢？孔子对“君子”有过这样一个界定，叫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先把这个实事认真做了，让言论跟在后面出来，而不要先说后做，这就是君子了。所以孔子说，我只要能遇到这样的君子，能遇到恒定如常、享有信誉的人，就已经不错了。

这种恒常之心，其实应当是一个人立于当世的基本依托。孔子说，怕就怕有些人生活在很多的假象里，他在迷惑世人的时候，其实也迷惑了自己的心。孔子说：“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本来自个儿什么都没有，却要装作有；本来是空虚的，却偏偏要装出饱满富足的样子；本来很困顿，却装作很奢华，这样的人是难于保持始终如一的，也就不会有好品德了。

在自己的生命中保持恒常之心，需要坦率的勇气。也就是说，一个人接受自己的现实，真诚面对自己，这是信誉的起点。我们今天说，诚信诚信，诚是信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忠诚，没有了一份真切的诚意，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对他人守信呢？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比诚信还要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够有恒，保持平常心。如果一个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梦之中，总是幻想要去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那么他会始终做不到脚踏实地，很难进步。

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恒常之心，不轻易改变，这是对于自己的诚意。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障对别人的信义。如果这点都做不到，那么你就会常常陷于迷惑之中，就会缺乏一种真实的自我估价。

诚信之道(4)

有一篇寓言故事说得有意思。有一只山羊，它早上起来想出去吃点东西。它本来想去菜园里吃点白菜，这时早晨初升的太阳把它的影子投射得很长，山羊一看，天啊，我原来如此高大，我还吃什么白菜啊？我改去山上吃树叶得了。

它转身往山上跑，等跑到山上的大树旁边，天都到中午了，太阳照在头顶上，这时山羊的影子就特别小。山羊一看，我原来就这么渺小啊？我还是回去吃白菜吧。

等它跑到菜园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这时候夕阳西下，它的影子又拉长了。山羊一看说，好像我还真能吃树叶。它就再往大树那儿跑。

一天的时光，这只山羊就在太阳投影的迷惑下，一口东西没吃着。

这不就像我们的人生吗？有时候一种外在的投射，一种虚幻的假象，在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比真实的自己要高大很多，又在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比真实的自己要渺小不少。

一个人的心怎么样能够保持着恒常的判断呢？这需要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保持一颗平常心。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迷惑的能力。孔子的答案是这样的：“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老师说，你不是想提高道德吗？我就告诉你两条原则，第一叫“主忠信”，要以忠诚、信用作为你内心的依据，能够立住这一点，就不错了。第二点叫“徙义”，就是你可以有改变，但是必须要合乎道义。内心主于忠信，合乎道义去改变，做到这些，那不就提升品德了吗？一个人品德提升之后，才能够辨惑，不至于像山羊那样会因外界的变化而无所适从。

孔子又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都有吧？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得不得了，希望他长长久久，千年万世，一直这样活着才好呢。这就叫“爱之欲其生”。突然之间，又恨上这个人了，就恨不得他马上消失，希望他短命。这就叫“恶之欲其死”。孔子说，你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难道不是迷惑吗？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应该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就会活得很明白，而如果感情用事的话，就会陷于无穷的迷惑之中。

一个人如果不能保持恒常之心，失去自己内心的判断标准，就会出现很多的迷惑。我们现在总说世象纷纭，希望哪个神灵借我一双慧眼，让我好看清复杂的世象。真正的慧眼何在呢？它不仅关乎智慧，还关乎一个人的自我判断和内心恒常的力量。要想对世界守信，对他人守信，先要看看能否对自己的生命忠诚守信。这是你辨惑的前提。所以孔子把崇德、辨惑连在一起分析，在他看来，提高道德是分辨迷惑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忠信的论述很多。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我们看，孔子提到忠信，不是孤立地提一个标准，而是把很多标准放在一起，包括了仪态的庄重威严、热爱学习、忠诚守信、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方方面面。

诚信之道(5)

孔子说，一个真君子，如果他的内心不厚重，不庄重，那么他就没有威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怎么显得那么没有分量，那么轻薄，见风就倒，听到点什么风声就容易改变判断，其实那是因为他内心本身就不厚重啊。

但是，内心的厚重是怎么来的呢？这不是先天得来的，而是要靠不断的学习。一个人如果不断地提升修养，不断地去学习思考，他就不会浅陋，就不会固守在他的局限上。

怎样做到君子，还有两条很重要的原则。“主忠信”，就是他内心要有一种立命之本，以忠、信这两种道德为主。“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不结交不如

自己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结交的人在道德上、在能力上都比你强，你就会有压力，你要见贤思齐，这样你就会得到提升。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不跟不同道的人交往。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跟同道中人来往，以便保持人生方向的单纯性。不论哪一种解释，都是说交友要慎重。

一个人如果按照以上原则做了以后，这个人会不会就不犯错了？不是的，没有谁会永远不犯错。不过，犯错也没关系，一旦错了，不要固执己见，要赶快改正过来，这还是君子。

以上这些就是孔子对于君子道德的描述。这里提出的“主忠信”，它不是孤立的，一定是跟其他的原则相辅相成的。

经常有些朋友问我，《论语》里面我记住哪一句话就够了？或者是问，对我现在的生活哪一句话能有直接的引导？我觉得，经典的东西需要融会贯通，它不会只靠某一句话或者一个理念，就让一个人安身立命。虽然孔子也说“恕”这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但是我们想想，在这种宽恕的背后，那需要多少信念来支撑啊？需要多少融会贯通才能达到？孔子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微言大义，说出来看似简单，但是都有广博的文化积淀，都有一些内在的理念在支撑。

关于信，还有很多表现在孔子学生的言论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有子是孔子的弟子，他说了三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语言环境里，人际交往都离不开说话，我们都在承诺，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兑现吗？你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吗？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那要看你的诺言离道义有多远。如果你的诺言符合道义，兑现的可能性就会高一点，这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个人如果能够恭谨有礼，对别人毕恭毕敬但又符合礼义，那么他就远离耻辱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依靠的都是可亲可信之人，那么为人行事也就很可靠了。

我们看，这里又是一组关系。在这里，“信”也没有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核心，而是说讲信用一定要符合道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种种挑战，一个人光有单一的内心道德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做“信史”，就是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诚信之道(6)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叫做《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镌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崔浩和高允两人依据实录作史的精神，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多秉笔直书，有些史实在后人看来是很不堪的。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说史官真不好，为什么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

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看到，这十年间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这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诚信之道(7)

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到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一副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就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接下去，“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真要有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他们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

什么，老百姓这时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依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诚信之道(8)

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交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直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叫做“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叫做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

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来说，只有守住诚信，才有未来。我想，对于诚信，每一个时代可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解读。

让我们保有内心的诚意，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接受现实，朴素面对，并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守住信誉，通往未来的道路一定会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观念，大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积极价值吧。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从《论语》出发，结合今天的现实，以《论语》中的诚信来引导今天的生活，走好我们人生的路。

诚信之道(9)

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当我们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体系，当我们的整个道德水准提升之后，不仅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会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会孤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建立和守住信誉，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诚信的社会。

本色于丹（代后记）

本色于丹(1)

张越：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光临《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将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于丹：你好，张越。

张越：你好。去年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于丹：对。

张越：事隔一年，今年春节再开讲《〈论语〉感悟》。和去年比，你觉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于丹：变化太大了。其实，这次还不只是和去年春节讲《〈庄子〉心得》相比。这次还是在讲《论语》的解读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论语〉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变化了。这次再讲《论语》，当我走进国宏宾馆旋转门的时候，心头百感交集。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老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三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地做题。

有一天，他把三道题做完以后发现书里头还夹着一张小条，也是一道题，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正十七边形来。他想，这大概是老师多给他留了一道题。他就开始做题。

这道题挺难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来。他就拿着作业，晃荡晃荡回学校交卷。他把作业往老师那儿一放，老师一看就开始哆嗦，问他，这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他说，是啊，这题挺难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师说，这道题是一道两千多年前的题啊，阿基米德没做出来，牛顿也没做出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书里夹着这张纸条，但我到现在也没做出来。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儿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

老师一说完，这个学生就快被吓哭了。学生说，要是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道两千多年来都没做出来的题，那我肯定也做不出来。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而一举成名。

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当时万卫老师扔给我这张纸条，让我讲《论语》，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题，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开讲，有一半因素是被万卫老师蒙来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讲坛》也熟，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不少备选的主讲人要来《百家讲坛》讲《论语》，你不是教传媒的吗？以前也老来这儿跟我们聊天，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对很多主讲人的讲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来录一下，录完后我给有关主讲人看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讲能更有点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从学校就来了，穿着现在到处都能看得见的绿条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时的衣服，里面穿着一白背心。我上讲台的时候，导播对我说，你背心上有银色的花，反光。

我说，那怎么办？我没带别的衣服。你看我现在上《百家讲坛》拎的那个包，一般都装着好几身衣服。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没衣服可换，最后大家给我出主意说，你那背心能翻过来穿吗？当时我想，不就是录一个样片吗？《百家讲坛》都是这么录的，先录样片。我也没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后正式播出的《〈论语〉心得》里，我那背心是翻着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为前面有花。

本色于丹(2)

我一上来开口就说，哗啦啦讲完了一节内容。大家非常鼓励我，我说完之后大家都鼓掌，问，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这时，我就清楚地听见万老师在导播台上说，来，于老师接下来就讲《论语》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让我讲《论语》。

张越：今天现场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间在这儿听她讲《〈论语〉心得》的吗？哦，有。阿姨，于丹她现在的样子跟上次比差别大吗？

观众：我觉得还可以。

观众：我觉得于丹老师在这儿讲课肯定跟在大学里讲课不一样。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来说，于丹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听着挺新鲜。现在于老师比原来讲得更成熟、更老练了。

张越：跟您第一次听她讲《论语》比，您觉得她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观众：没看出来。

张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没看出来啊？一年半以前她脸上没疙瘩，今天脸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对。

张越：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品不好，而是说明于丹老师精神压力很大，休息不够，是不是？

于丹：对，有这个原因。

张越：是不是这次再讲《论语》比上次的压力大得多了？

于丹：这一次，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叫“临事而惧”。

张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为第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没想过要讲第二次，我就随手把讲好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这一回再来七讲，发现剩下的都不大好讲，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一次我准备得比第一次更认真，更细致，内在的逻辑性更强，材料更丰富。

张越：你怕到什么程度？你唠叨吗？怕的时候。

于丹：不唠叨，我从小就不唠叨。

张越：你不跟周围人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于丹：没有。我是独生女，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没人可唠叨，养成了不唠叨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自己跟日记本唠叨。

其实，刚才这位阿姨说得挺对的，就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来我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唠叨的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太多的事情都是发乎心，止乎心，很多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写日记，有日记在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变化的。讲《〈论语〉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从我自己的状态上来讲，我觉得压力很大，不太想再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一次讲得很不系统，《论语》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讲到。比如说，这次讲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没有讲过这个；又讲了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核心的思想理念；还有讲仁爱之道和诚信之道，我想，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价值，应该从经典中把它们梳理出来。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接着讲《论语》了。

张越：你说你“临事而惧”，惧什么啊？

于丹：这种“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再讲《论语》是一种责任。第二个方面，这次开讲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张越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传媒。

本色于丹(3)

张越：对，在开策划会的时候。

于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的电视传媒，这是我的专业。但是，现在各个地方请我的人都是让我去讲国学，讲孔子，讲庄子。这些内容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一直讲这些，那我的专业又该怎么办呢？毕竟我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自己还要再进修，那么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在我内心，所有这些都是惧的理由。

张越：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的。我做电视做了十多年，每次录节目之前都特别害怕。我以为别人都不害怕。我终于发现，大家都以为于丹不害怕，其实她也害怕，我算踏实了。

于丹：有太多人认为张越从来不知道害怕，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现在说起来，我们都害怕，是吧？

张越：吓得后背都湿了。

于丹：那是你穿多了。

张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是圣人之道，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的。

于丹：对。不过，孔子说到“临事而惧”这四个字的时候，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好谋而成”。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有点害怕，说明你心里在乎，你认真对待了，但不能怕得连这事都不做了。你要好好用你的智慧，全心投入，认真谋划，最后把它做成了。由“惧”而到“成”，这个“惧”才有价值。如果“惧”到放弃，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越：2006年“十一”期间你第一次开讲《〈论语〉心得》，那时你觉得这有可能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国学热吗？

于丹：当时我以为只是帮万卫老师一个忙。今天想起来，开讲《〈论语〉心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一点喜剧色彩。后来弄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我真是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组的主编王咏琴老师曾经私下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的故事。当时台里决定讲《论语》，让她编《〈论语〉心得》节目，万卫老师宽慰她说，没关系，反正经典必须得讲，这就算是上面加一个任务，如果这个节目做完后反响不好，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你想，万卫老师跟我熟，让我讲一个我就讲一个，当时我就反穿背心上台讲。万卫老师没当回事，还跟王咏琴老师说做不好没事。我们大家都这样放松。我估计这件事不仅我始料未及，连《百家讲坛》也始料未及。我们都觉得要认真真把这个事做了，毕竟《论语》是经典，对着孔

子我们不能不认真，但做完也就完了，后面怎么样我估计当时大家都没想过。

张越：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我最早走上电视也是这样，人家告诉我没找着合适的嘉宾，让我去当一次嘉宾，帮一个忙，就去了。录完之后，其实就是让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要知道就干不了了。

于丹：后来就不是帮了，而是一直在这儿忙着了。

张越：对，所以无知者无畏嘛，一开始误打误撞就做起来了。

于丹：有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了。

张越：你那次讲完《〈论语〉心得》，我记得在中关村做第一次签售。我听敬一丹说，她去中关村，就老远地望见一堆一堆的人，车都堵了，她当时的反应是中关村出事了。

本色于丹(4)

于丹：我也以为出事了。我当时想，我怎么赶上一个出事的时候上这儿来呢？给我耽误了怎么办？

张越：后来你才知道，那个惹事的就是你。

于丹：后来接我的那车就直接开到地下车库，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货梯那儿。工作人员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我才把这个事跟我联想起来。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从货梯上去，到签售现场。

张越：《论语》距今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忽然之间你在今天这个时刻引发这么一场热潮？你想过吗？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大家根本听不入耳。

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想，所谓对于国学的关注，仅仅看这个世纪之初还是不够的。我们也不用说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巨变，其实就看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一开始，辛亥革命，中国稳定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一下子土崩瓦解。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而不是改良式的渐变，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颠覆。

八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要让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进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体系打碎了。

接下来，三十年代，整个民族救亡，持续到四十年代。从文化学术上来讲，那个时候尽管有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个人式的，在整个救亡那个大环境里面无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构，无法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在这种坍塌的废墟上忙着救亡救国。

等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后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由于一种泛意识形态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次全民性参与的批判，我认为其负面影响比五四运动时期还要大得多。五四运动是一次精英化的、学理化的运动，而批林批孔则是非理性的运动。

我们还记得，孔子的脑袋那时候被画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为他脑袋长得不平。人们又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到哪儿都不认识路。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说孔子，就是孔老二；孔老二有什么思想，就是克己复礼；大家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几个人真的知道孔丘何许人，他有什么思想？我们见到的是一

个被妖魔化的形象，完全只是一个被批判的载体，至于他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不关心了。

我们知道，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辛亥革命，这中间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颠覆，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它遭遇了两次全面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什么呢？

本色于丹(5)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载体，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思想的遭遇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血脉在二十世纪遭遇了重创，出现了断层。那么要怎么去整合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人们心中的困惑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已经用整个二十世纪走过了这么长的苦难历程，我们对历史已经批判得过多。今天，我们要赶快完成一种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建设的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最好的时机。现在国力强盛，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科技发明很多，那么这么多的进步，就能让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受到提升吗？有时候，人们会由于选择过多而迷惑。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没什么选择，大家心里都很平衡，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我觉得今天面对文化建设的呼唤和选择标准的迷惑，一定要有文化的回归。关于这种回归，并不是说儒家文化或者说整个的中国文化变为唯一的精神救赎，大家在上面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说在这种回归的历程中，我们更多地发现内心的愿望，找到参照的坐标系。当每一个人都进入内心的审视和对中国文化有所领悟的时候，我觉得文化建设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建设起来了，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开始参与了。我觉得，今天的国学热这个热潮就是这么起来的。

张越：你说到我国整个二十世纪经历的精神的纷乱及其重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经历这个过程，这一百年全世界都在干这件事情，颠覆传统，然后价值纷乱，然后回归传统，西方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于丹：这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我认为这种回归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整合以后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张越：就我们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价值多元化，同时又伴着价值虚空。

于丹：对。

张越：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不快乐，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说，这一次的热潮中，你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吧？

于丹：对，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也跟我出现的方式有关系，我不是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如果以教授的身份来开讲，我应该讲传媒学，但是我讲的不是我现在教的专业内容。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面对《论语》，完成了一次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进行了一次用普通民众话语的沟通。我认为，这里面是非学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觉得《百家讲坛》是一个大众传媒的平台，它要面对的就是普通的大众。大家可以说，这个人她不是什么教国学的大学教授，她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文革时期才出生的女人，这一切都跟经典不太沾边，但是这样一个人她能读《论语》，那么一个农村大妈她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中学生他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下岗职工他有什么不能读的？我都这么读下来了，大家愿意读都可以读啊。

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还原一种经典，也就是说，让历史活在当下，用生命去激活经典，这是一种可能性。大家都参与到里面来了。我觉得，我传递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起我讲的内容，其价值要大得多。

本色于丹(6)

张越：你觉得你现在讲《论语》，讲《庄子》，说话方式跟你以往讲课时说话的方式一样吗？

于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在大学里面讲课，其实也是一个老讲故事的人。我觉得，我是念传媒专业出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当你传递无效信息，用语流去袭击受众的时候，你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传播信息，不在于你传递的信息有多少，而在于里面有效信息有多少，就是人们要能记住你的东西。

怎么记住？人们一般容易记住有情节的东西，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从单纯的义理去阐发，你语流再庞大，也是无法记忆的。所以，我在大学里讲课就老讲故事，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方式。当然，讲的内容不同，学理层次也不同，可能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更有意识地跟大家沟通，一定要离现在的生活近，让大家带着疑问去贴近经典。没有这个问号，经典那个沉甸甸的封面是翻不开的。

张越：你是说，讲得再好，如果对方全没听进去，那就是没用的。

于丹：对。

张越：这是学传媒的人的一个基本训练。

现在我替观众问一个问题。有观众问，你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在当今社会还有积极意义吗？

于丹：其实，《论语》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孔子那个时代提出来的。今年应该是孔子出生后的两千五百五十九年，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东西，当然有很多是过时的了，比如说礼。那个时候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礼是维持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纽带，所以孔子对礼有很多迂腐的坚持，比如他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他对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果在礼上越级，孔子认为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再比如他还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这在朱熹的时代都有过很多的探讨。这些东西都属于过去的时代，但是《论语》里也有一些我认为是关乎人性、是属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核心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信”。什么时候人们可以不守信呢？我曾经说到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台里正在做的“感动中国”节目里的。2007年4月，江西有一个农民，在救火的时候牺牲了。他留下三十一岁的妻子陈美丽，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才几个月大。她丈夫临死的时候，她知道他欠了别人的债。虽然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可以抵了这个账，但她还是在村里贴了还债告示。后来就真的有很多人找她来要钱，累计起来有五万多块钱，其中有将近四万没凭没据。陈美丽就这样养着老的小的，替她丈夫还债。她只有一个理由，说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口碑不错，我要让他走得心安，让他走得没有牵挂。其实像这样的行为，人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信”。这个“信”字不一定就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内心的。

再比如说“忠恕”。我们可能说，今天的时代，没有皇上，不需要愚忠了。什么是“忠恕”？有人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心为忠”，真正的忠诚是忠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如心为恕”，他人心如我心，将心比心，你就会懂得宽恕。你觉得这样的“忠恕”，还有“仁爱”、“正义”，这些东西一定全都过时了吗？我就觉得它们没有过时。我们可以不在学理层面去探讨这种精神传承，我们只要去看看现在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有我们笃信的东西，难道不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在回归吗？

本色于丹(7)

在农村，可能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她也没念过《论语》，但是她会知道孔夫子。你

去农村看春联，许多人家贴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家没多少诗书，但是他们懂得为人要厚道的道理，要守信誉，要正义待人。我觉得，这些核心价值是我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它颠扑不破，不管你写出来还是不写出来，它总跟这个时代有着融合。

张越：对，世间肯定有一个正道存在，不管由谁来解释，由谁来传递，但是“道”是存在的。

于丹：对。

张越：一个东西可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它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

于丹：就是因为它简单朴素，微言大义，所以到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去用你那种方式解释它。经典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好比是白开水，我老觉得白开水是好东西。我们今天，你可喝的东西很多啊，喝酒，各式各样的酒，喝下去，哗地一下子烧起来了，觉得多过瘾，比水好吧？咖啡，茶，要是冲泡一杯，满屋子都是香的。各种果汁，乳酸饮料，碳酸饮料，什么都好吧？但是，为什么你还一定要喝水呢？因为水没有添加剂，它最健康，它是人体最必须的东西。再说，各式各样的饮料里都有水，咖啡、茶没有水能冲吗？酒没水行吗？果汁没水吗？而且，你喝完什么最后不都还得喝点水吗？

水可以在咖啡中活着，可以在茶中活着，可以在果汁中活着，水无处不在，无处不需要。你说它不好吗？同样，你能说经典都过时了吗？其实，有许多东西不过时，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最朴素，最健康。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的意义。

张越：这里有一个你们传媒系学生的纸条。他问，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于丹：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哪一代人要怎么面对经典。每一代人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国学，不是经典，而是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如何真诚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如果你对自己真诚，你就希望能够把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链接起来。你可以不读《论语》，你去读西方的著作也可以，你去读艺术也可以，你热爱郊游或者你热爱收藏都可以，只要你真诚面对自己的生命，你就会想办法让你的生命丰富起来的。这时，有些人也许会有机缘遇到国学，发现自己生命的根就在那里，不过不遇到也没关系。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讲，首先要真诚面对自己，而不要被外在的世界迷惑。现在的时代，外在的东西太多了。你看电视，一会儿觉得这个人的标准好，一会儿又觉得那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究竟是成为你，还是成为他呢？有时候，在你做了N多个选择之后，你唯独没有选择成为你自己。国学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冷静的，缄默的，带着一种温暖，你去认真读懂了，它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坦率地说，我挺不喜欢叫什么国学热。我从2006年一讲完就不喜欢什么国学热，但2007年太热了，我到现在还是要说，我们不要把国学过分放大。我觉得，放大国学或者放大我本人这个符号，任何过分的放大都是其意义和价值的贬损。更好的方式是去真诚面对，就是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学不能救赎一切。一个人不到特定的时候，有些东西他就是读了，心里也没感觉。

本色于丹(8)

你就说《论语》吧，我算是跟它挺有缘分的，小时候家里就给我讲，长大了我又读的是古典文学的硕士。应该说，我二十来岁时，这个东西已经通读下来了。其实呢，好多话是不懂的。我二十来岁时最喜欢的话都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样的话，觉得这多掷地有声啊。这些话就是警句。二十来岁，谁不往小本上抄警句啊？抄点西方哲言、流行歌曲，跟抄《论语》，都是一样的，就这些话怦然入心。但是，时光再往前走，我走到三十岁，走到四十岁，我现在喜欢的话就是子路、颜回大伙儿在一块儿谈理想，最后问老师，你的理想是什么啊？老师

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雍也》），我做到这三条就行了。这样的话，我年轻时看，一点感觉也没有，觉得朴素简单到让你不足以给它记忆的空间。

张越：年轻人喜欢大话。

于丹：喜欢大话。我现在才发现，读书是一个逐渐让自己的心安静和回归的过程。我们不缺乏远大理想，但是缺少从脚下达到理想的道路。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灯下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做到这三条的人有多少？我们现在老想着远大目标，治国平天下，但是谁能把身边这老的、小的和朋友们都安顿好了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忙起来，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三种人。

我发现，圣人好就在他把普通人的理想给完成了。他不会忘记身边的这三种人。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爱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要真想做到的话，心中一念它就到我身边来了。我现在喜欢的都是这样一些最简单的话。

司马牛问老师什么叫君子，老师回答：“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内心没那么多忧伤，也不太恐惧，这就是君子了。司马牛有点不以为然，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我估计司马牛的反应跟我年轻念书时的感觉差不多，觉得怎么那么简单啊，不需要建功立业吗？光是个心情啊？孔子就跟司马牛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一个人要是天天摸着良心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上不愧于天，下不作于人？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我都好好做到了，我就能踏实睡个好觉。我自个儿心里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能做到这样，难道还不是君子吗？这种话有味道，我觉得这就叫微言大义。

刚才那个学生问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对待国学，其实所有好东西都是一辈子的事。这辈子你喝酒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喝腻了，有一段你戒了咖啡了，还有一段不喝浓茶了，但是水这东西，你虽然觉得它没味，可它是这一辈子喝得最多的。经典也是这样。别指望我们年轻这一代，二十岁的孩子都去诵读经典。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背不背它都没关系，你是不是都看懂也没关系，只要你二十岁的时候有二十岁的体会，四十岁时有四十岁的体会，六十岁时有六十岁的体会，一辈子相伴相随，只要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足够真诚，那么你总会有机缘读得懂它。

本色于丹(9)

张越：我同意你说的，《论语》或者国学，不可能完成天下万世的救赎。

于丹：对。我觉得现在要反对一种新迷信，就是对于国学的迷信。有些朋友问我，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悟到点什么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后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给我了？还有人下岗了，或者离婚了，也问我，我看《论语》中哪一段对我现在能开导？《论语》再好，它也不是万能大字典啊，我们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去查。

我觉得，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我们的心只有从这样的狂热中逐渐沉静下来，才能离真实近一点，离经典的本意近一点。

张越：现在《论语》非常非常地热，大家在困惑当中就把它当成治世宝典了。你能不能说《论语》有些什么欠缺？

于丹：我觉得《论语》产生在它那个时代，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我们不能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认为它有欠缺，但是可以说它有局限。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格局，为其所限就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孔子那时候有电脑吗？他能打开一个 Windows 视窗，用百度去搜一个什么条款吗？他肯定找不着啊。他那个时代有现代的立法、司法吗？有现在的金融制度

吗？什么都没有。

以今天的眼光，怎么看《论语》的局限，我觉得要分学理性的眼光和非学理性的眼光，是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用学理性的眼光，我觉得要去请教专家，人家会非常严谨地去分析儒家的思想系统，这不属于今天我们在电视平台上讨论之列。如果以非学理性的眼光，也就是大众眼光的话，我就想提出来，我们尽量去看那些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是死揪着它的局限性去死缠烂打，也许就会获益。

所以我说，一方面，《论语》不是完美的，它并不是一个宝典，不能救赎所有人；但另一方面，不能就说《论语》完全是过时的，不能因它有局限，就让我们对它完全丢弃。我觉得，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张越：我也认为《论语》并不过时，它里面的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生活、对人的心灵非常重要地重要，给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立点规矩，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觉得《论语》里面对一些非常本质的讨论有一些欠缺，比方说它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可是没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不讨论死亡，怎么活就说不清楚。人能不能只靠自己的道德本性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可以研究的。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从自身现实问题出发，走到了《论语》里，这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能再从《论语》出发，走向更广阔、更结实的价值构建，来安顿我们的身心。

于丹：是这样的。《论语》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奉为经典的一部书，当时不过就是孔子的一些课堂言论，他的学生把笔记整理整理就弄出来了，整理出来的这二十篇实际上没有太内在的逻辑体系。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一种过分神化的眼光去把《论语》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时候，把孔子还原成凡人，可能会激发我们心里真正朴素的爱？

本色于丹(10)

张越：你现在成了一个传播传统文化的符号。这里有一个观众的问题，他问你，你觉得应该怎么传播传统文化？你觉得正确的、好的传播方式是什么？

于丹：对我来讲，我很少使用“正确”这个词，因为“正确”的另一端就是“不正确”。其实，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是多选题，不是单选题，我不喜欢用绝对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方式来思维。我觉得，传播传统文化不是每个人都去做的事。也就是说，经典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去阅读，要自己去感受。每个人从原典中读出的心得都是不一样的。像我，有可能变成一个职业传播者，所以我要去考虑传播策略，比如大家怎么样能够贴近经典，能够记忆经典，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做传播，更多的人可能更需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去好好体会，这就够了。

张越：今天，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来谈一谈对传播经典文化的认识。

王大千：感谢于丹老师对孔子文化的传播做了这么多有益的工作，使大家关心和关注传统文化。我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从事的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当下的国学热引来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是用孔子的话来说比较好，叫“有教无类”，无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接触经典，感悟经典。这就是寓教于乐，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受益，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掌握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

张越：他真正的问题还没问呢，下面是他要问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听你说“我希望你们忘记我，记住我做过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丹：“记住我做过的”，就是记住，可以由一个非专业的、普普通通的、也不算老的这么一个中国女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把经典读了，而且心有所得，那么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大概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读经典，并没有多难。而且，她读完了以后还觉得挺快乐的，觉

得她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是有憧憬的，有梦想的，跟周围的人也都可以友善相处。所以，好好读一读，有这个悟性就行，不一定要有很深的学理，我们都能感受到经典的魅力。这就是她做的一件事，贴近了经典。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可以是于丹，也可以是别人，所以忘了于丹，记住这么一种感受，就够了！

张越：你讲《论语》之后，影响力扩大的同时，骂你的人也多起来，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于丹：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坦率地说，我能理解。我觉得，大家对一个现象有关注，比没有关注好。既然我能够讲一心所得，人家千心万心皆有所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对经典进行阐发。我能说话，人家也能说话，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東西一定是不同的。

一部《论语》，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种学理性严谨的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一种儒教的研究；从儒术的角度来解读，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统治术。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而我不属于这些理解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我就是一心所得。

本色于丹(11)

有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读硕士的时候是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我理解这个纯学理的角度；但我读博士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专业的，我更知道《百家讲坛》让我站在这里的意义，给我这个时间段和频道资源，那就必须要对观众负责。我们看，坐在这里的叔叔阿姨，他们有可能只是小学毕业，但是他们都知道孔夫子在历史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圣人，他说的话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以一种大家能懂的方式去聊一聊吧？所以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我觉得人家只要抱着一种真诚的意愿，说你哪个地方讲得不够严谨，或者你这种提法站在学理角度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对我有好处，可以让我的讲解变得更完善一些。而且，不同的声音越多，越说明更多人关注，这对《论语》的解读大有好处。

张越：批评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会扰乱你的心情吗？

于丹：我觉得要看怎么讲。所谓的批评，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抱有诚意的探讨，另外一种，有一小部分是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抱有诚意的探讨，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尊重，我要对人家说谢谢，因为我确实没有人家那么专业，那么严谨，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都得去看。至于人身攻击的谩骂，一笑随风就好，那个东西不会干扰到我。

我觉得孔子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好自己，让自己在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我努力去把《〈论语〉心得》讲好就行了，何必与人去争辩呢？我从来不敢说我提供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会准确地传递出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圣贤之道它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贴近人心的，它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它能给你解忧。所以，有人骂我两句，说对了我就吸收，说得无聊的我就根本不会听进去。

张越：我看到一部分观众、读者把你当精神导师了，而且是万能灵药，而这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这种情形时心里是什么感觉，高兴吗？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

于丹：怎么说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爱我的孩子，孩子真是磕了一个大口子的时候，我可以替她去裹伤，我可以抱着哄哄她，但是我再心疼也不能替她疼啊。也就是说，每个生命的成长都必须穿越你必须经历的磨难，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帮你。我不觉得我真的可以去帮大家，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需要一种生命自救的力量。我会更信任经典，经典也不能救赎一切，但它能让我们找到心灵的力量。

这一年中，我接到的信据说有六千多封，我也数不过来了。有很多人说的是孩子得了抑郁症，有孩子吸毒的，有老父亲卧病在床的，有单亲母亲的问题，有孩子刚出生要起名的??没有几个人跟我探讨《论语》或《庄子》，找我说的都是这些事。看到这些，我心情很复杂。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信件比那些所谓的争议给我的压力大得太多太多，因为这是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我首先必须感激大家的信任。但是??

本色于丹(12)

张越：来信你都看吗？

于丹：我会看，但是我真的无法一一回信。张越，我要借你这个平台跟大家道一声歉。我现在接电话也很少。有些人可能问，你的电话怎么现在老在秘书台，为什么接不了？如果我每天接电话，那我一点别的事都不能干了。我的电话太容易得到了，因为我原来在那么多电视台讲课，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我的电话。我这号码多少年也没改过，就怕朋友们找不着我。现在，不要说回信，就连电话我都不敢接了。

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喜欢我这种朴素的态度，因为我还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还有我的专业，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成天就神神叨叨满世界在那儿讲，变成一个符号，我自己的东西反而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当我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最后我变得不再是我自己。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你所说的那句话，我希望每一个人生命的出发点都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我能读懂多少经典。我觉得我也有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有压力，关键就是我们自己都要找到一种调适的方式，都要相信没有一个外人能替你做出判断，最终能够穿越的只有你自己的心。

张越：我们说，我们学经典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其实，于丹她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人，做不了那么多事。

于丹：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如此之大的救赎力量，包括孔子。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以这些经典作为养分，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整个人生的成长就是因为看见太多太多这样融会贯通的人，所以我才会对这些经典产生信任。

我读硕士时候的导师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聂石樵先生。我特别敬重我的导师和师母。师母邓魁英先生是教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我在他们家读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都年过花甲。我读硕士是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聂先生当时已经是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但他坚持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抄稿子，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打下手。现在的大学呢？导师使唤学生都习以为常了。我的导师和师母非常关心学生，但是不能让学生为他们做一丁点事情，什么抄抄写写，跑个腿，送个信，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价值体系是不符的，怎么能这样使唤学生呢？而且，聂先生上课从来不迟到一分钟，对他来说，该上课的时间那就是天条。聂先生这些做法到今天对我还有很深的影

再比如我的博士导师黄会林教授，到七十多岁还在给本科生上戏剧文学课，不管外面是评奖还是开会，没有听说过老太太调过课。她老是把“严是爱，松是害”挂嘴边，学生们都服这个气，是因为这么些年看见老太太对她自己比对学生严格多了。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读这些经典，就是因为老师们的人格让我对这些经典有一种信任。他们是我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人，所以我信任经典。我觉得，一个人光学习不够，他得把经典变成身体力行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刚刚知道经典是好东西，其实等你真正进入以后就会发现，它点点滴滴地进入你的生活，最后变成你的生活方式。

本色于丹(13)

张越：我想起一个传媒同行谈到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对于丹最大的伤害不是你批评她，而是你过高地期待她和赞美她。

于丹：这是刘春(资深电视人，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说的吧？刘春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记得这是有一次我们俩在咖啡厅聊天的时候，我自己跟他说的。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真实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种虚幻的美，如果以真实的陨落作为代价，那我宁可要一种真实的残缺和不甚完美。我不喜欢现在加在我身上的种种褒义词，说我怎么出色，怎么优秀，怎么智慧什么的。

张越：不喜欢的词还有什么？

于丹：类似的词太多了，这些词我统称为褒义词。褒义词就是个标签，一个褒义词放在我的身上就会让我离自己的生命远一分，当我要是被标签糊满的时候就看不出我本来的颜色了。

我喜欢什么呢？我只喜欢我真实的状态，我就活在当下这个状态。有人说你多成功啊，那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优秀”这样的词只有镌刻在墓志铭上它才作数，我还得接着往前走呢，你哪里会知道下一步等着我就是个什么样的失败呢？你现在把标签已经搁我身上了，我才四十岁，我后头还有三四十年呢，你让我有多大压力，我老得为褒义词活着吗？我不愿意。我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好好做一个本真的自己。

这也是我要传递给大家的态度，我们要活在真实中。谁都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坦率真诚地面对生命，可以让自己活得天真一点，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会犯错。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自己精神更轻松，更真实，也会有更大的创造性，结果呢，我们可能走得更远。

张越：你知道怎么可以做到本真的你自己吗？

于丹：你说。

张越：特地干两件没出息的事，捅两个娄子就好了。

于丹：以我的水平，根本不用特地，天天都在干，就是你们看不见而已。压力再大点的话，我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会越来越多的。

张越：能举个例子吗？你最近丢人现眼的事是什么啊？

于丹：我最近丢人现眼的事很多。比如说，我最近丢东西的几率明显上升，丢完东西后满世界去找。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在一起的状态就挺真实的。我每次跟学生上街，他们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跟着，别瞎走”。我一会儿又丢了，我就赶紧跟上。我的学生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且总认为我会出错。

现在谁把我的智商估计得比较低，我就觉得他一定属于我的亲人之列，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我；谁要说于丹老师是万能的，那就离害我不太远了。我坦率地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想做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就是有好多毛病，我的学生都知道，所以会这么管着我，我特别高兴。

我的学生给我做了一个礼物，一个拿小碎片拼的拼图，都是拆得特别碎特别碎的小片。拼图上是他们所有人跟我的头像，大家的脑袋都散落在各个地方。我发现，他们的头像都特大个儿，而我的脑袋给扔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还特小，找半天反正都找不着我，那么拼起来不就是更费劲？肯定会把我的耳朵拼在某一个男生的脑袋上。后来大家都会拼错，挺好玩儿。这是个玩具，但是有我们大家的头像。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心里感动啊，真的快流下眼泪来了。

本色于丹(14)

如果他们把我一大头像搁中间，他们跟小葵花似的围在周围，那我肯定就把这个东西扔了。如果他们给我做一个大相框，而不是一个玩具，我也会不喜欢。他们知道我就爱玩，他们给我的东西都是他们当下正玩的东西。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一件挺牛的事，我学生玩的什

么我都跟得上，而他们也愿意带着我玩。

还有，他们认为我的脑袋就应该比他们的小，就扔在一个犄角旮旯，这件事让我挺感动。张越，我跟你讲，现在让我感动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是一种，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的感动。在他们眼中，我从未改变，我是一个随时会出错的人，可以跟他们不着调地玩，可以跟他们皮打皮闹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叫做真实。

我看这些古圣先贤的书，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我挺喜欢我一直走过来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在北师大。按说大学有挺严格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搞本科教学评估，要用什么样的 PPT 课件，要有什么样的备课教案，要有什么样的考题、考卷，要有什么样的标准答案，要有什么样的上课流程，等等，都有规定。但是，我在北师大一开始就是个特别另类的老师。

有一次，教务长王一川老师特别认真地找到我说，于丹，我找你核实一件事。有一位老督导员跟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早上上课，刚上了十几分钟，外边下雪了，她把课停了，让学生都穿上棉袄跟她下楼，大家去玩雪？他还没说完，我就回答，王老师，那人就是我，这事肯定是真的。这肯定违反本科教学规定了，我就问，这事儿还处理吗？我心想，这事过去好多年了，应该过了追诉期了吧？王老师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老督导员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没想到北师大还有这么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教务长一直在提倡从游式教学的教学理念。孔子的学生怎么跟他学习呢？是像小鱼跟着大鱼和乐乐在水里游玩那种方式。这样的学习，大家不仅在学知识，而且在感受这个世界。王老师跟我说，于丹，你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从游式教学例子。我说，千万别普及，你也别表扬我了，你不处分我，就挺好的了。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其实，我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在大学里面不是一个很标准、很规范的老师。当时之所以带学生下楼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班上有好多福建、广东、云南的学生，这一辈子没见过雪，第一次看见雪花，你说你能讲什么内容来剥夺他们这一刻看雪的欢喜呢？下雪了，他们隔着玻璃窗，摸不着，感觉不到，多遗憾啊，所以我得把他们带下去。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这种想法是很不靠谱的，但是我没受处分，还居然受到鼓励。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现在有很多人都对大学里的管理制度很愤慨，认为不近情理，还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纠葛，很复杂，我的幸运就在于我没有受到什么束缚。从小到大，我经历这种成长的穿越，不仅是因为在我心里有中国文化的积淀，更重要的是因为不断有人以他们的言行在加强我的信仰。

张越：说说来时的路吧。在你成长的历程当中，受什么样的人 and 事的影响比较大？

本色于丹(15)

于丹：那太多了。我从小是一个挺封闭的孩子，喜欢文学。长大以后，读大学，读研究生，就有老师给我的影响，让我知道点人读了书以后要做什么。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文科生挺自卑，老觉得是理科学不好才学文了。我是一个数学没学好的女孩，念文科还不算太丢人，要是男生就特抬不起头来了，一看就是学习不好。

我那时候老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知识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这怎么办啊？就是在这种心情里面读完大学，读完硕士。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后来我硕士毕业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恰好把这句话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大概看了五六年，这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宋代张载的四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给我影响挺大，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为天地而立，他的坐标就很大。“为生民立命”，就是对百姓有使命感，

能做大就做大，能做小就做小；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肯定挺自私。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翻开那些佶屈聱牙的古代经典，一般读者已经念不懂了，你总得干点什么，让人们明白吧？也许一个人能做的事是简单甚至浅陋的，但是我觉得因陋就简地做点事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你不能为大家奉上一桌蛋糕的时候，哪怕奉上半桌窝头，那也是做点事。什么叫做“为万世开太平”？其实，万世太平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话挺激励我的，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再说，有些人，就是我说的身体力行的那种人，他们流露出来的人格风范可能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刚才我说到我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和师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这样。

在影响我的老师里面，第一位是我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王老师。那个时候没有重点中学，我上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北京的一一〇中学，在百万庄那儿。我学习一直不算太好，偏科，除了语文底子好点，数理化从来没学明白过，体育也不好，所以那时我在班上完全是一个资质平平、什么都不出色的学生。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王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当时本来要留校，他分到这所中学实习，赶上文革回不去，就留在这了，没再回北大。他是四川人，一个真正的才子，个子小小的，手中不离小烟嘴，一天到晚抽着烟，写得一笔极漂亮的字。

他在中学年复一年教书，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都没有考上大学。王老师年事渐高，遇见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中文系大学生来，考上哪个学校都行。我记得他给我们上完课，总是给我吃小灶，给我拿好多的卡片让我背，让我在课上给大家讲。他一直就这样关注我，还带我去他家。

本色于丹(16)

他住在锣鼓巷小平房里，破败的小屋子一进去整个是一张床，旁边那个小书架上，一个一个像中药盒子一样的小抽屉，拉开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卡片。老师拉出一个一个抽屉给我看，让我背。我记得，师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床缝被子。师母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她长得太美了，让你觉得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蹲在破屋寒窑的小板凳上缝被子真是不公平，但是她眼神特安详。我老师是个大才子，让才子站在局促的地方拉着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为他有学生。

他们俩就那样闲闲地跟我说话，觉得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了。老师跟我说，你看你两个哥哥都没有读上中文系，你以后是不是能读啊？我就这样跟着他念到初三。后来考高中，我考上了北京四中。我妈妈跟我说，她去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我这老师拉着她居然哭了。他说，从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一个梦想破灭了，她不能在我手里去上大学了，不过我还是愿意这孩子上四中。

我上了四中以后，有时候也回去看老师。念到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听说王老师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我就去医院看他。在薄薄的被单底下，他几乎完全塌陷在床里，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当时正要报考研究生，几乎已经决定了要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候，文艺美学流行，大学生们都觉得研究文艺美学多好啊。

当时看着他，我心里太难受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决定考古典文学研究生。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的手一下把我抓紧了，然后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挤出一个字：“好！”后来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这就是托付啊。

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我不是报考一周之前去看了我的老师，也许后来我学的还是文艺美学，不会去改考古典文学。我也是注定要进聂先生他们家门的。我一开始是奔着邓先生去的，我要考唐诗宋词，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没有不喜欢古典诗词的，风花雪月多好啊。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先秦两汉文学。他跟我讲，你喜欢唐诗宋词，你要是学了这段，元明清你都可以顺下去，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你可推不了，你没有那个功夫。他说，你现在还小，下下功夫，读一读先秦诸子，要真把经史子集能啃下许多的话，那么你想再往下读唐诗宋词，你自己去读，一定能读到底，很顺畅。就这样，我就跟着聂先生学了先秦两汉文学。

有时想一想，人生的道路好多时候都是阴差阳错，可能就在某一步路上，某一个人的一个点拨，机缘凑泊，你就改变了道路。我觉得，只要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份诚意，你会融合许多人的生命，对自己的方向能够迅速进行调整，让每一个经历都成为值得记忆的瞬间，最终成就你的人生道路。我这么一路走来，跟经典结缘，大概有太多太多人的生命在里面，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

张越：以前上学，后来毕业当老师，有想过出大名吗？

于丹：没有。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你想，一个独生女，也没上过幼儿园，一个近乎自闭的孩子，她会想到出名吗？我从小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好像也不太需要我发愤图强。

本色于丹(17)

自闭长大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其实挺恐惧的，不太想去闯荡。我从小就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心灵生活的质量比物质生活的质量要重要。我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种非常宁静的空间。这就要说到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昆曲。现在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讲昆曲啊？其实，我就是拍着曲子，念着诗词，风花雪月这么长大的一个孩子。我喜欢这种缓慢的、精致的、内敛的生活。尽管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那种使命的担当，但是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去生活，我希望的方式是一种静水流深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让我选择，我会认为我的归宿是在文字的表达上，而不是语言的表达上。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张越：尽管这不是你所期待的方式，但是忽然之间你真的就出名了，而且非常出名。出名之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最突出的生活感受是什么？

于丹：喧嚣啊，就是很喧嚣啊。有时候让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有意义，有我做事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希望这种价值不要让我违背了自己的本真，就是让我能够真实地去发挥我有限的价值，而不要不真实地去发挥所谓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发展跟社会需求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过犹不及啊。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我对“红”、“热”这些词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我写的《于丹〈论语〉心得》后记里面，题目就叫《〈论语〉的温度》。我说，我喜欢的温度永远叫做温暖，就是一种恒常的温暖，不是火热，因为骤热离骤冷也就不远了。我不希望我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贡献，怎么怎么着出色，我认为那都是虚妄之词，我做不到，我也没有想做到。

我做了什么呢？在天津，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跑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比较贴切的褒奖。这小孩说，阿姨，我看完你这书才知道孔子他说的不是废话。够了，这就够了。这么大的孩子，她可能听父母辈说过批林批孔，认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书，觉得《论语》不是废话，也许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论语》了，这就够了。我一个人无法做到让中国文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因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后才会发生的现象。

张越：我看了你一天的日程表，2007年5月25日，当时你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这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晨九点三十分参加记者见面会，十一点给四川教育界人士做报告，

下午一点半到购书中心参加央视一套节目启动仪式，然后是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签售，五点坐车前往重庆。很可怕的一天，经常是这样，是吧？

于丹：经常会这样。这样一个节奏，看起来是非常紧张，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节奏。比如说，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先跟成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通电话，闲聊一下，因为正式活动的开始还是比较晚；再说就在我去重庆的路上，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咱们那次直播的时候看到的金沙遗址。你还记得那个小金面具吗？

张越：记得。

本色于丹(18)

于丹：我当时就去了金沙遗址，在里面走了一大圈，非常震撼，真是鬼斧神工。我心里有很多东西被唤醒了。遗址看完之后，路上我一直在听 MP3，听歌。到了重庆，那边还有一批朋友在等着，大家就出去吃喝玩乐了。

你拿出来的可能恰恰是我很紧张的一天，但是我记得在那一天前后还是有一些间隙时间的。那些间隙时间中也有我喜欢的东西。我现在的生活是很紧张，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的生活永远都是硬币的两面。大家会看到一种外在的节奏，但是我的心里，一定还有着另外一种节奏，不会耽误。如果这两种节奏实在太冲突，我会把外在的节奏放慢一些，我心里的一些东西有它固定的位置，是不能退却的。

张越：我想知道，对你家人来说，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成了什么样子？比如你的孩子怎么看，她妈妈整天往外跑？

于丹：我的孩子经常在晚上本能地要藏我的书包，因为她认为我没书包可能就不出门了。我一回家，她总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你还走吗？今天我又是紧张的一天，我在这儿聊完，还要去京西宾馆参加政协的会。我今天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忙完这些事后，晚上回去能哄着孩子睡觉。我白天在外面很紧张，但是如果卸了妆躺在孩子身边，拍着她给她讲小红帽、大灰狼的故事，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天还没安顿。

一个人总有安顿自己的方式，虽然说我在外面可以做很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现在对于我而言的安顿，一个是能够哄着我的孩子，让她睡觉，再一个是还能有时间写几笔日记，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能坐下来跟我妈妈好好聊聊天。我希望每天都能够真正实现这样几件事情。

张越：据说你的孩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的编辑小祝，因为她认为只要这个人一进门妈妈就要走，所以这个人是“绑架”她妈妈的一个坏人，是吗？

于丹：这还是停留在我的孩子早些时候比较幼稚的那些感受上，这是她一岁多时候的认知。两岁以后，我觉得小孩的智商有了惊人的飞跃。她现在开始知道祝叔叔是好人了，尽管她不喜欢他，但从理智上肯定这个人是好人。当她判断祝叔叔今天是给她妈妈送点书什么的，不带她妈妈走，她会递给祝叔叔个把橘子。如果发现今天还要带走，估计也没有什么好脸色给祝叔叔。

我女儿的创造性还有了很多自己的发挥。我前几天回去，有一天她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我坐在旁边拍着她，灯全关了。她指着天花板上的影子说，妈妈，你说那是什么啊？我说，那不就是外面投进来的光吗？路灯的那个影子，是圆圆的一个圈，里面还有一个黑点。我两岁七个月大的女儿就胸有成竹地反驳我，不，那是我妈妈的眼睛。我当时就有点蒙，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她就翻过身来，用她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很清晰地跟我说，那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是妈妈的眼睛。她告诉我，她每天都躺在这儿，看着这儿怎么想。

有时候，我觉得孩子的判断力可能永远都会超乎我们的想像。我每一次出来录像，她的表达方式都不同。最早的时候，她不到两岁，我会跟她说，妈妈要讲课去了，你帮助帮助我吧。她说，我给你吹吹吧。她就趴在我胸口吹吹。那个时候，她磕了碰了，大人就是给她吹

吹。后来她越来越有力量，等到她两岁多，我说我去讲课，她就会说，我亲亲你。她亲完我了，就说，你不害怕了吧？我说，我不害怕了。一会儿，她会带着姥姥、爸爸，还有看她的小姐姐，一个小小的人儿带着一大堆人鱼贯而入，在那儿指挥若定地说，我妈有点害怕，我们大家一起亲亲她吧。她会率领一堆人来亲亲我，这就是她帮助我的方式。再大一点，她就很有奉献精神，把她那些小猪啊，小兔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卡子都拿出来，逼着我穿上职业正装时要别上一个，说，你戴上我的卡子吧。再说，为什么她后来对祝叔叔不太愤恨了？就是因为她跟姥姥说，不用祝叔叔保护我妈，我长大了保护我妈。

本色于丹(19)

我觉得她这些话都挺支持我。我会看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长，但也没有这么小的孩子的成长让人感到惊讶。我一直是一个对人性抱有信仰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单纯的孩子的心。她在一开始，对世界是多么透亮天真。她是无私的，她是有爱的，而且她毫不吝啬地表达。她能够用那么幼小的年龄，那么弱小的躯体，去帮助别人。

张越：你这么个好玩、好闹的自在的性格，现在你要把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么计算着去见记者、接受采访、做报告等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对你自己来说是是不是有点？

于丹：无奈，是吧？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可以说，一方面这种生活的节奏是我不喜欢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现在单纯地抱怨或者是停下来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也是不现实的。

张越：好，最后我再替观众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私人生活，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孩子了。有一个观众称你为女强人，她说，女强人于丹老师，您的爱人生活上会有压力吗？

于丹：如果说我爱人有压力，那也不是因为现在才有的。从他决定娶我的时候起，他就应该有压力，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太差，所以他觉得一直对我负有责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种压力没有多大改变。这个压力不会因为我后来成为这个或那个什么，再有所增加。

张越：你觉得现在的情况对他有困扰吗？

于丹：现在他顶多觉得我比过去更忙了，而且他跟我妈最担心的可能就是我的身体。除此之外，我估计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会有更多的心疼。

张越：下一个问题。请问于教授，听说您现在的工作安排很紧张，作为孩子的妈妈，丈夫的妻子，您如何处理您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于丹：我现在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工作基本上像压缩饼干一样往一块儿压缩，别人觉得这一天压不出空，我可能会压出好多，这样压缩打包以后，再去腾出来一些比较完整和松散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讲，这个时间表就是早上八点半我孩子出门以后我就可以密集地安排了，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我能够在晚饭前回去，孩子也回来了，而且我能陪妈妈吃顿饭，那么整个晚上的时间就会是自己的了。如果这还不行，退而求其次，那就争取在孩子睡觉之前能回去。尽量别让我两头见不着孩子，这是我一天时间表里面的底线。当然，这一天中间的时间，包括午饭的时候，都会被压得很满。

张越：时间不短了。现在我们用一个小朋友的问题，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谈话。这个小朋友是这么说的，我看到你做讲座，觉得你说话的时候，嘴里面好像有两块糖，脸蛋鼓鼓的，好可爱哦。

于丹啊，你跟我们坦白，你是不是每次都在嘴里塞上两块糖？

于丹：我倒觉得嘴里不一定是含着两块糖，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心里头永远含着一块没有化尽的糖，一直在化，一直在化。

张越：感谢于丹教授跟我们交谈，也谢谢到场的各位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2008年春节期间的《百家讲坛》开讲她的《〈论语〉感悟》，欢迎收看。好，谢谢于

丹教授。